

第八章 西南的挣扎和溃灭

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蒋介石、陈诚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力量，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大举进犯。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至一九四八年七月止的两年中，在人民解放军的痛击下，国民党军被歼灭了二百六十多万人。在整个华北、东北地区，仅剩下济南、新乡、太原、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秦皇岛、锦州、沈阳、长春等几个孤点。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则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征兵征粮急于星火，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为了求生存，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英勇斗争。在这两条战线上，革命势力汹涌澎湃，弄得反动派手忙脚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了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也是最后的一次全面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企图作垂死的挣扎，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会议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历时七天。

会议的地点是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大礼堂。

会议的参加者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廉、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百韬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以及军长余锦源等二十余人，加上国防部一些主要负责的厅长署长等，共一百二十余人。

会议由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三人轮流主持。蒋介石在会

议开幕时的发言，充满了沮丧的神气，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把两年来在军事上的惨败，完全归咎于许多战场指挥官的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他感慨地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最后，他郑重地警告大家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会议的头两天以大部分时间就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几个较大的战役的失败，进行了检讨，尤着重于西北战场的宜川战役（此役胡宗南部刘戡所指挥的五个师有三万余人被消灭）和中原战场的豫东战役（区寿年兵团六个师和黄百韬兵团一部共九万余人被消灭）。大家因为知道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对于他指挥上的错误，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说就算了；集中地批判了邱清泉（时任兵团司令）的骄横跋扈，对区寿年兵团被围时坐视不救的行为。同时，还演了一幕滑稽戏，说是黄百韬救援区寿年兵团行动很积极，救出了区兵团的一个师，作战有功，由蒋介石亲自授给他一枚所谓国民政府的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

会议的第三天，由当时任国防部部长的何应钦作军事形势的报告，这是会议期间最紧张的一幕，也是蒋介石何应钦间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何应钦报告的头一段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大肆诬蔑，企图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共；第二段就悬挂的许多军事地图说明各个战场的双方态势；第三段也是最动人心弦的一段，他赤裸裸地公开了两年来作战损耗的数字，计：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共三百余万人；步枪一百万支、轻重机枪共约七万挺、山炮野炮重炮共一千余门、迫击炮、小炮共一

万五千余门，还有战车、装甲车、汽车以及大批的通讯器材和大量的各种弹药数字，我记不清楚了。他报告的最后一段，只是几句抽象的话，因为他提不出挽救危局的任何方案。

何应钦的报告刚一结束，大家就议论开了，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有的说：“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那样一点力量，打了十年都解决不了他，现在共产党已发展成为这样大的力量，这个仗怎样打下去？”有的说：“陈辞修太可厌，这个仗就是他极力主张打的，胡说什么三个月五个月解决共军主力，结果弄得一败涂地，他应负完全责任。”也有的说：“中国的存亡（应该说是国民党政权的存亡），和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决不会坐视不救，美国一定会大力来帮助我们的。”议论纷纷，……总的说来，充满了悲观疑虑的情绪，真是连一点欢乐的影子也没有了。

何应钦为什么要把这些数字公开报告出来呢？他是具有两种用意的。第一，两年来对人民解放军作战失败得这样惨重，表明他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因为军队指挥权和军政大权这两年来都是由陈诚掌握着。第二，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和陈诚迫使何应钦交出军政部长，其后又派他到纽约去充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既无实权，又无事做，何应钦是极不甘心的。他作这样的报告，实际上就是对蒋介石和陈诚的泄愤和报复。

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那时任装甲兵司令部的上校参谋长（司令是徐庭瑤），蒋介石特地叫他参加这次会议。同时蒋介石又派他的两个侍从秘书轮流到会，记录每个人发言的内容并视察会场的情况。这一天何应钦的报告和一般情绪的反映，他们立即向蒋介石汇报了。据曹圣芬（即上述两个侍从秘书之一，湖南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以后对我说：“当我们共同把会场情形和何部长报告内容向总统报告时，先生（指蒋介石）气得满脸红涨，连胡子都翘起来了，两手撑着在室内走了许久。”第二天也就是会议的第四天，蒋介石穿着军服，挂着他自己发给他自己的一枚最高

勋章和美国杜鲁门总统赠给他的一枚勋章，气汹汹地走上了讲台，把脸孔绷得紧紧的，把凶恶的目光向会场一扫，随即开始发言了。他说：“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经过许多的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度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局，……”很显然，蒋介石这一番话，是针对何应钦说的。但这位何部长坐在主席台上若无其事地倾听着，没有任何激动和不安的表情。蒋介石继续说：“对共产党的问题除军事斗争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方面的斗争，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个哲学问题。”我听了他这一段话，好象进入了迷魂阵似的，是怎样的一个哲学问题呢？以我这个仅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向来把哲学当做一门高不可攀的学问，蒋介石打了败仗，为什么扯到哲学上面去了呢？蒋介石在发言中既没有说出他自己的哲学是什么？共产党人的哲学是什么？也没有说出对付的方法，更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最后，蒋介石说：“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九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的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他还讲了一段大汉奸和封建皇帝的奴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扫平太平天国及捻军的历史，勉励大家一心一德，矢勤矢勇，担负起削平大难，挽救国家民族的重大责任（即是要大家为挽救四大家族的国家去

奋斗)。

会议的第五、第六两天，多为参加会议的人发言。哪些人说了话，内容如何，我记不清楚了。但有一个总的印象，就是几乎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申诉本指挥单位处境的困难，向国防部要求增加部队，要求新成立部队的番号，要武器、要新兵、要军粮、要器材、要车辆、要弹药……总之一句话：全是困难、危险、叫苦。

我也在会上讲了约二十分钟的话，除了简要地报告新疆的情况外，我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我今年由新疆两次来南京，路过兰州、西安、武汉等地，会见过不少的军官，他们都说对共产党的仗很难打，前方部队充满了悲观和厌战的情绪，几乎所有官兵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师出无名，怎能鼓励士气呢？

（二）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钱，而物价仍然不断飞涨，几乎是一天几个价钱。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一天一天地减少，离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如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又怎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三）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弃儿鬻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使之杀敌致果呢？总统说，现政府还有基金九亿美元之多，我建议：自八月起，所有官兵的副食费一律改发现洋，每人每月叁元，将校尉级的薪金也改发现洋，自每人每月五元起至三十元不等，最多者不得超过三十元，借以维持官兵们的生活。”我的发言尤以我的建议得到了与会者许多人的同情，孙立人、黄百韬、李树正等在发言中都支持我的意见。

会议的第七天也是最后一天，由参谋总长顾祝同提出一个战略方案，原文记不清，大意是这样的：为巩固长江以南地区，防止共军渡江起见，应暂时停止战略性的进攻，将现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的部队，编组成为几个较强大的机动兵团，将原

有的小兵团概行归并。这几个兵团应位置于徐蚌地区、信阳地区、襄樊地区，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共军渡江，并相机打击共军。在长江以南地区迅速编练第二线兵团。这个方案获得了全场一致的同意。这个方案也就是国民党反动集团企图作垂死挣扎的方案，但很快地被伟大的毛主席军事思想彻底粉碎了。

闭会后的第二天下午七点，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励志社宴请参加会议的人，蒋介石又讲了一些打气的話，并散发了一篇题目叫“为什么要剿共？”的宣传印刷品，他叫大家带些回去对官兵讲解。这篇东西的内容仍然是什么“共产党是不要国家民族的，共党是苏俄的第五纵队，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共妻……”等等的陈词滥调，想以此来迷惑人心，鼓励士气。实际上，蒋介石早已众叛亲离，陷于全民包围，空前孤立的境地，他的一切阴谋和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

会议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叫我和杜聿明、黄维去见他，他对杜聿明说：“现在派你去徐州‘剿总’当副总司令并兼一个兵团司令，徐蚌为首都门户，关系甚大，我们有强大的兵力在这个地区，共军是不敢轻举渡江的。”对我说：“你不必回新疆去了，现在调你为华中‘剿总’的副总司令并兼一个兵团司令，位置于鄂西北地区，主要是要防止共军进入四川及阻止共军在宜沙一带渡江窜入湘西。”对黄维说：“派你到平汉路的信阳一带编组一个兵团，主要是防止共军进犯武汉。”他对我们把任务交代后，还说了一套他那早已被证明无用的战略战术。杜聿明曾提出他不兼兵团司令，由邱清泉担任，蒋介石当时没有同意。我对于新的任命，没有多大兴趣，于八月十日偕眷带着小孩到上海、杭州一带去旅行，在车上遇着范汉杰（他那时任东北‘剿总’的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夫妇，他对于自己的任务，感到困难重重，不想再干下去。我们于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回到南京。当天下午五时蒋介石把我和范汉杰、黄维三人找去，问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走？我们不敢说不想干，只说还有些问题正在和国防部接洽尚未

获得解决。蒋介石带着很严厉的态度说：“不行！你们可派一个人留此办理。”他随即叫军务局长俞济时通知空军总部，于明天派飞机把我们送走。我对于蒋介石那种家天下的作风，本来早已心怀不满，在一九四八年也已看出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重重，临近总崩溃的前夕。由于自己没有决心跳出火坑，又不知追求真理，投靠人民，仍然走着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我的“清剿”计划

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国防部发表我为华中“剿总”的副总司令（总司令白崇禧）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是月下旬，我由南京到汉口，向总司令部了解华中方面的一些情况并洽办一些事务后，于九月中旬到了沙市，组设第十四兵团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新成立的）。当时国防部及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先后命令拨归我指挥的有下列各部队：

（一）原驻在南阳附近的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王凌云所指挥的第二军（军长陈克非，辖第九、第七十六、第一六四三个师）、第十五军（军长刘平，辖第六十四、第一六九、第二四三三个师）及三个纵队（番号为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这三个纵队是由南阳地方团队编成的，共约一万余人）。华中“剿总”命令王凌云率上述各部队于十月间撤离南阳向襄樊地区转移，归入我的指挥。

（二）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辖第一三三、第一三四两个师）。这个军当时在襄阳、宜城一带。

（三）第二十八军（军长原为李勃，后为刘秉义，辖第五十四、第八十两个师）。这个军所属的第八十师于十月初开抵当阳，第五十四师的一个团开抵荆门，军部及直属部队和五十四师的主力为大水所阻，尚滞留在天门附近。随后这个军的军部及直

属部队在天门被解放军歼灭了大部分，副军长顾心衡被俘。

（四）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这个军原归胡宗南指挥，驻在陕西宝鸡一带，国防部于九月间令该军取道陕南开老河口地区，归入第十四兵团序列，但胡宗南坚持不放，这个军始终没有过来。

（五）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辖第九十四、第一九四、第一九九三个师）。这个军原驻川北的万源、城口一带，国防部令该军经竹谿、竹山、房县、保康、南漳向荆门宜城间地区集结，归入我的指挥，预计到十二月初才能集结完毕。

（六）湖南省保安第一旅（旅长张际泰）。这个旅驻在沙市附近地区，以后我向国防部建议，改为陆军第二九八师。

当时在汉江以西地区，没有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只有江汉军区所领导的黄德魁部约二、三千人，以远安、荆门、南漳三县间地区的东风为根据地，在其周围地带进行游击。他们经常以突袭和伏击的方法，消灭国民党军的小股部队，破坏公路，截击车辆，以及发展组织，号召贫雇农起来进行斗争，打土豪，分田地。虽只是一股小小的力量，但其影响日益扩大，声势日益浩大；弄得鄂西北地区经常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远安县政府人员不敢住在县城办公，当阳县城常是一夕数惊，宜沙亦时常告警，十月间我到当阳视察第八十师时，顺便找当阳县长和国民党当阳县党部的书记长谈话，我问他们当阳县内有多少“土八路”在活动，他们答约有四、五百人。我问那位书记长，当阳县有多少国民党员，他答有二千多人。我当时对他们说：“这个县的人口为二十多万人，国民党员就有两千多人，还有地方保安团队的力量，为什么还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对付几百名‘土八路’呢？几乎经常要我们派一个师或至少两个团来驻防，大大减少了我们可以机动使用的兵力。”他们都哑口无言。是年十二月间我到南京，有一天何应钦邀吃午饭，在座的有陈立夫、黄季陆、黄少谷等，我曾把在当阳所见的情形对陈立夫说了，陈立夫当时脸上青一阵红一

阵，觉得很难为情似的。其实国民党组织的涣散，到处都是一样，岂仅当阳一地而已。可见国民党虽号称有几百万党员，而实际上是徒具形式，毫无组织力量的。

国防部赋予我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解放军进入四川和在鄂西地区渡江。基于这个任务，我感到必须于一定时期内肃清在汉江以西地区活动的共军力量，使鄂西北地区成为一个安定区，充分利用四川、鄂西的丰富资源和人力，培养实力，这样东进可支援武汉，北进可规复中原。这是我当时昧于时势，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个主导思想支配下，我策定了一个“清剿”黄德魁部的计划，大要如下：

（一）为防止共军窜扰四川及在鄂西地区渡过长江，我军务于最短期内肃清在汉江以西地区的共军势力，使鄂西北地带成为一个完整的安定区。

（二）以第二十军主力和第二十八军的一部扼守襄阳、宜城、倒口、利河口、塘港、石牌镇、沙洋之线，防止桐柏山区和江汉军区的共军窜入鄂西。

（三）第二十八军之八十师以当阳、远安为基点，逐步向北推进；第五十四师的蔡时彦团（这个团已开抵荆门）以荆门为基点，逐步向西北推进；第七十九军的先头部队（一个团或两个团）以南漳为基点，逐步向南推进；务期会同一举歼灭盘据在东巩的黄德魁部主力。

（四）由第二十军派一部负责肃清冷水铺（在荆门东北地区）附近的小股共军，由远安、当阳两县的保安团队负责肃清各县境内的小股共军。

（五）为配合军事行动，积极加强补给和通讯业务，并维护沙市、襄阳间、沙洋、当阳间之公路安全。

（六）命令江陵、荆门、当阳、远安、宜城、南漳、襄阳七县积极组训民众，协助运输，加强地方基层组织。

（七）将兵团司令部于十月间移驻荆门，督促这个计划的积

极实施。

这个计划策定后，我将兵团司令部于十月中旬移到荆门。那时由王凌云率领由南阳南下的先头部队已到达新野、邓县附近。由方靖率领的七十九军先头部队已到达房县附近。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在荆门接到蒋介石自北平发来的一个电报，叫我到徐州去担任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二十五日又接到国防部发表正式调职的命令，当天晚上刘峙（徐州“剿总”总司令）来电表示欢迎，他的办公室主任郭一予等亦以同学关系来电欢迎并促到任。我对于这个任命，感到十分彷徨。当时我对于华东解放军的情形不了解，自然是踌躇的一个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我所最担心的是考虑到指挥上的困难。徐州“剿总”所辖的部队主要为邱清泉、孙元良、黄百韬、李弥四个兵团。李弥是我的旧部，人颇浑厚，黄百韬也较为踏实，我估计这两个兵团在指挥上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孙元良为人虚伪狡诈，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我是深知道他的；邱清泉骄横跋扈，狂妄自大，向来目空一切，听说在豫东战役，他连蒋介石的亲笔命令都拒不执行。孙、邱这两个人是很难对付的。而邱清泉兵团又是淮海战区中的骨干，这样，怎能指挥的得心应手呢？同时，七月间我在南京开会时，有位中央通讯社的记者雷渊澄（一九四六年在新疆我就和他认识）曾来我家访谈，他告诉我，他在徐蚌一带住了半年，最近才回来。我问他那边情形怎样，他说：“前途很不乐观，军事上我军完全处于被动，对于共军行动，几乎是个瞎子，而共军对于我们，则了如指掌，尤其糟糕的是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和军队纪律太坏，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他还对我举过好些事例。我回想起他的话，也成为我踌躇的另一个因素。

综合上述这些原因，我和几位高级幕僚几度研讨，并经过一天的思考后，觉得与其延误于将来，不如慎之于事先，因此决定辞受新命。以“到鄂西后情况渐明，正在作种种规划和积极部署以及自己对徐州方面情形不熟悉”为理由，于二十六日电蒋介石

及参谋总长顾祝同请求收回成命，并婉复刘峙及郭一予等。蒋介石于二十七日又自北平发来一个限一小时到的电报，记得内容大意如下：“某电悉。吾弟到鄂西后的种种规划，颇为妥善，深洽余意。惟今后战争重点在徐蚌。徐蚌为首都门户，党国安危所系，希吾弟毅然负此艰巨，迅即赴徐与刘总司令及各将领妥善部署，勿再延迟为要。”这是一个严厉的命令，再也不能说辞不受命的话了。我乃于二十八日复蒋介石一电，大意如下：“某电奉悉。将此间事务稍加料理后即赴京转徐。惟有一事不能不事先为钧座呈明者，徐州方面以邱清泉兵团为骨干，邱为人骄横跋扈，日空一切，与友军不能和衷协调，如万一将来再发生类似豫东战役的情事，以致贻误戎机，则所关甚大，谁负其咎？……”电文发出后，我将诸事料理后，于十月三十一日率一部分人员由荆门到沙市，候船东下，即在当天晚上接到蒋介石自南京发来一电，原文大意如下：“已决定派杜聿明前往徐州方面负责，吾弟可仍供原职，希按原拟计划，积极实施为盼。”第二天国防部也来电正式收回成命。

徐州被围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华东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南下，在新安镇、碾庄地区，截住了西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韬兵团，摆好了聚歼的阵势。中原野战军的一部斩断了蒋军交通中枢津浦的徐（州）蚌（埠）段，控制了徐蚌间的广大地区，另一部向陇海路杨山地区实施钳击，割裂了商丘刘汝明绥靖区和杨山邱清泉兵团之间的联系。南线徐蚌间的解放军部队，又由南向北，直逼徐州，迫使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南面迎拒解放军，不敢东援黄百韬。至此，徐州外围完全控制在解放军手中。诚如蒋介石自己所预料到的，为中国四大家族的“党国”的存亡所系的淮海战役的序幕揭开了。

徐州被围，蒋介石和国防部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迅即命令当时集结在平汉线上确山、驻马店一带的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火速东援。人民解放军在伟大的毛主席战略思想指导下，已在灈河与浍河之间的地区布置了一个巨大的口袋，等待黄维兵团钻进这个口袋。

东进的黄维兵团，在解放军的严密监视下，于十一月十九日进到南平集附近，遭到解放军的坚决阻击，伤亡颇大。黄维以其主力强渡浍河，企图击破解放军的阻击，迅援徐州，但是他的希望完全落空了。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被华东解放军全部歼灭，给黄维心理上以极大的震动和恐惧；同时，他们渡过浍河后，发现解放军的大纵深阵地，知道已钻进了口袋。乃于二十三日下午命其主力向浍河南岸退缩，企图退到固镇去和李延年兵团靠拢。解放军乘其混乱之际，猛力合围，将黄维兵团的十二万人马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长二十华里南北宽十五华里的地区内，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这时的蒋介石，真是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直蹦乱跳。他的本钱快要输光了，已无可调之兵了。当时除在平津地区由傅作义指挥的部队约六十万人实际上也已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外，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内，没有一个完整而又较有战斗力的军，仅仅只有几个新兵编练司令部新成立的一些部队和残破得很严重正在整补的几个师，这是完全不能参与战斗的。所剩下的，就只有白崇禧的张淦兵团，胡宗南所属的几个军，和我所指挥的几个军而已。蒋介石曾计划空运胡宗南所属的第一军到徐州，经空军总司令部研讨后，认为没有这样大的空运能力；同时胡宗南亦表示不愿把他唯一独存的骨干部队调走，因而作罢。就这样，国防部于十一月下旬的一天（确切日期记不清楚），一连以几个限半小时到的电报，调我所指挥的第二十、第二十八两个军立即开武汉集结，待船东下。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是四川人，他的部队属于四川军阀杨森的体系，干部和士兵绝大部分都是四川人；他们接到

东调的命令后，情绪很颓丧，杨干才对我说：“我们队伍开到鄂西后，大家很高兴，因为靠四川近，现在又要东调，官兵们都不愿去。”我除了安慰和勉励他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当时王凌云所指挥的第二、第十五两军及三个纵队，已大部分到达老河口、襄樊一带，方靖的七十九军主力到达了宣城、南漳、保康一带。我命令第二军继续南下，开到荆门、十里铺、江陵间地区集结。

大约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或二十八日，蒋介石发来一个限半小时到的电报，叫我和王凌云立即到南京去；另由武汉方面转来的电话，也是同样的指示。我即以电话通知尚在襄阳的王凌云，要他到荆门来一同走。在下午四时左右王凌云到来了，我们同乘车于当晚到了沙市；等到第二天下午才搭上一艘小的轮船东下，于二十日下午二时左右到了汉口。三时我和王凌云往见白崇禧，我向白汇报了鄂西北方面的全般情况，王凌云汇报了他所率部队南移的经过和到达的位置，还谈了一些关于全国的军事形势及徐蚌方面的紧张情形；并商定次日（十二月一日）上午由总部通知空军第四路司令部派飞机送我们去南京。

当我们辞出时，白崇禧说还有事要和我谈谈，叫我留下。王凌云走后，白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原先是在会客室谈话），他亲自把门关上，然后和我同坐在一条长沙发椅上。他开始问我：“你看目前的形势怎样？”我答：“很紧张，很危险。”白说：“是的，情势确是很危险。东北几十万大军全部消灭了，而且这些部队大部分都是美械装备。共产党得了这样一大批精良的武器，他们有的是人，很快就可组成很多的部队。东北工业发达，物产丰富，更可大力支援军事。不仅这样，他们后面还有俄国人的帮助。林彪大军一进关，局势就更不好办了。”我插进一句问他：

“总司令看林彪大军是马上就会进关？还是要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有一个休整时期再进关呢？”白说：“我看很快就会进关来夺取平津，因为林彪部队的主力，实际上早已在锦州一带集结了。”

紧跟着白就把话题转到主要方面来了，他说：“徐州方面，黄百韬兵团已在新安镇、碾庄地区全部被消灭了，徐州被围，黄维兵团亦已在双堆集附近地区被围，正打得很激烈。现在总统电召你们到南京去，一定是要调你这个兵团东下增援。这样，武汉地区就仅剩下一个张淦兵团和鲁道源、张轸、陈明仁等几个军而已。而这些队伍，除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属张淦兵团）较有战斗力外，其余多半是临时编成，新兵很多，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你的部队再调走，武汉地区就显得更加空虚。共军陈毅、刘伯承两个野战军合起来兵力在一百万以上，他们还有许多地方武装力量。把你的队伍调去，恐怕也不能解徐州之围，而且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

我就问：“依总司令之意，应该怎样办？”白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一幅大地图面前，以很兴奋而又带有几份自信的语气说：“我们如保有武汉，必要时可同共军进行和谈，即万一武汉保不住，亦可退据湖南、广西、云贵及四川一带，保有西南半壁，以和共军抗衡。只要能拖延一个时期，国际局势一定会起变化，我们将来可得到大量的援助，主要是美国的援助，则事情还大有可为。”这样，就把他的企图完全暴露出来了。我听了他的话，低沉地思索了一下，觉得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在徐蚌地区被消灭，到那时，蒋介石非滚蛋不可。蒋走后由李宗仁起而代之，这正是四月间伪副总统竞选时，桂系使用了种种手段和大量金钱要李宗仁当选的目的。我心想，那时成了你桂系的天下，那里还有我宋希濂的地位呢？

于是，我也站起来，以严肃而认真的态度对他说：“‘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今时局艰危，到了极其严重的关头，如果大家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或尚可撑持一个时期，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样，在长江以南编练的第二线部队也可陆续使用。记得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三月在重庆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时，总司令在会上曾说，如不迅速遏止共军

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就会形成南北朝的局面。现东北已全部被共军占领，平津亦岌岌可危。如目前在徐蚌一带的主力再被消灭，恐欲求成为南北朝的局面亦不可得了。还是请总司令从全局着眼考虑问题。至于从我个人的情绪来说，我希望不要离开鄂西，尤其不愿意把我的部队分割使用，但目前总以救大局为主。”

白听了我的话以后，狠狠地望了我一眼，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样吧，明天你先到南京去，多了解一些徐州和黄维兵团方面的情况。如形势已无法挽救，去亦无补于大局，最好向总统及顾总长请求免调。”

第二天（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时，我和王凌云坐着空军派定的一架专机飞往南京，十二时左右在南京光华门外的飞机场降落，真没有想到蒋介石已派了总统府的军务局长俞济时在机场候迎，因为以往无论是到南京或重庆以及其他地方去见蒋介石，是从来没有受到过官方的接待的。我们同乘着一辆汽车直赴蒋介石官邸，刚进入会客室，蒋介石就从楼上走下来了，并且和我及王凌云握了手；这也是生平以来第一次，蒋介石对象我们这样的部属和学生是从来不握手的。

坐下后，蒋介石就问王凌云部队到达的位置及部队的实力情况，王凌云如实报告。接着我将鄂西北地区的概要情况和第二十、第二十八两军的开拔情形及七十九军到达位置报告后，蒋介石就说：“这次叫你们来，主要就是要把你们兵团的全部力量东调来增援徐蚌地区的作战，来挽救目前所处的不利形势。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我们的革命事业的危机，从未有过如今天这样的严重。现在徐蚌地区间所进行的决战，关系党国的存亡。希望你们部队尽速东开，加入战场后，先以全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再会同徐州的部队，击破共军，稳定战局，巩固首都和长江以南地区，这是非常重要的。望你们淬砺奋发，鼓舞士气，务要取得这一决战的胜利。”关于部队的调运办法及补给等问题，蒋

指示说：“等一会我告诉顾总长（顾祝同），今天下午开个会，叫有关的单位负责人都来参加，商讨办法，最要紧的就是越快越好。”从他的态度和言论上，充分可以看出他焦灼不安的情绪。

在飞机场时我就对俞济时说过，我有重要事，要和校长单独谈。这时，蒋介石就叫王凌云先走，叫我留下。送走了王凌云后，蒋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下后我就将在汉口见白崇禧的情形和谈话内容，向他报告。蒋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对于每一段话，每一细节，以及白崇禧当时的表情，都问得很详细，我汇报完了后，蒋说：“好，我知道了，你答复他的话，说得很得体。”

十二月一日下午三时，国防部召开一个会，参加的有参谋总长顾祝同，次长林蔚、萧毅肃，联勤总司令郭忏，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以及和作战运输补给有关的厅长、署长、处长等，加上我和王凌云共十余人，由顾祝同主持，商讨将第十四兵团全部东调的问题。首先讨论的是将第二军和第十五军由老河口空运南京后再车运蚌埠集结的问题，这是顾祝同亲自提出，说是总统指示要这样办的。空军总部方面主管运输的一位署长，就能调用的运输机数目、每架运输机的载重量和能装运的人数，往返一次所需要的油料数量，以及每天最大限度能往返的数次等，作了详细的说明。老河口机场没有一点存油，如要飞机携带往返油料，则装运量就要大大减少。最后的结论是空运这样多的部队，没有这样大的空运能力，这个计划是不能实现的。接着研讨轮船运送的办法，即是这些部队由老河口、襄樊地区步行到沙市集中，由沙市乘船到汉口，再由汉口换轮运到浦口再转运蚌埠（长江冬季水浅，汉口到宜昌，只能航行较小的轮船，所以要换船）。联勤总部运输署署长（记得是赵桂森，但不能确定）说，现在集中最大限度的运输力量，将第二十八军及第二十军运到浦口，最快也要到十二月十二日才能完成任务；如再运三个军（包括在最后的七十九军），就得要到年底或来年一月初才能运送完毕。由于这样

运送的缓慢，会上有人主张部队以急行军的姿态向蒙城前进，但计算行程，最快要二十天，同时在中途可能不断地遭到解放军的阻击，就会更耽搁时间，这个意见被否决了。又有人主张部队以步行和船运两种办法，尽速向武汉集中，并以一部分由火车运输，即是经粤汉路、浙赣路、沪杭路、沪宁路运到南京，再由津浦路转运蚌埠。这个意见，暂时保留，俟部队集中汉口后看情况再定。关于部队调运的办法，会议的结果主要是依靠船运，责成主管运输的机关，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会上还讨论了有关补给及其他的一些次要问题。这次会议从三时开到七时才结束。

晚上八时半，蒋介石叫我和二凌云去见，对王凌云说：“明天一早派飞机送你到老河口，你要督促部队迅即开沙市集结待运。”又对我说：“你暂时留在南京，和顾总长、俞局长经常保持联系。”

白崇禧图谋倒蒋

当一九四七年六月，刘伯承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威胁武汉和长江中游安全的时候，蒋介石政府感到万分惊恐，急忙调集了三十多个师，指派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设立指挥所于九江，来对付这个新的严重的局势。

白崇禧由一个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来直接掌握兵权，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他的野心很大，当然不会满足于这一个战区的指挥权。他在九江指挥所时，一再向蒋介石建议，将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徐州绥署（主任先为薛岳，后为顾祝同兼）两个机构统一指挥。蒋介石恐其兵权太重，尾大不掉，难以控制，没有答应他。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伪国大进行丑态百出的剧烈竞选，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桂系军阀如虎添翼。白崇禧利用当时风雨飘摇的局势，以指挥便利为理由，将兵指挥所移驻武汉。这样就

形成了两个高级指挥机关——程潜的武汉行营和白崇禧的国防部指挥所，而指挥权则掌握在白崇禧的手里，实际上就是逼走程潜和硬要武汉地盘。蒋介石对此毫无办法，最后只有将武汉行营撤销，调程潜为湘赣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迫于形势下这一着棋，一方面是为了应付程潜，另一方面也是想利用程潜在湖南的地位来牵制白崇禧。

白崇禧取得武汉地盘后，日益图谋倒蒋，使李宗仁得取而代之。他在军事上除张淦兵团（共有四个军）为桂系的基干部队外，多方拉拢河南的张轸（张轸那时任河南省主席兼信阳绥靖区司令官，有一个军和一些保安团队），鲁道源的云南部队（鲁道源那时任五十八军军长）及陈明仁等（陈明仁那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陈自东北四平街战役后被撤职，对蒋介石、陈诚心怀不满）。在政治上则尽力拉拢湖北、河南、安徽等省的参议员。

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早就存有使蒋介石集团与共产党打起来，打得双方精疲力竭，两败俱伤，他们就可从中取利的企图。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同白崇禧有过几次的谈话和听过他几次公开的演说，他都是痛骂共产党，反对和谈，认为对中共的问题，除武力外，别无解决的办法。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削弱蒋介石的力量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蒋介石的主力尚未完全消灭，白崇禧是绝不肯放弃这个机会的。他知道蒋介石仅存的本钱，只剩下以第一军为基干的胡宗南集团，以第五军为基干的邱清泉兵团，以第十八军为基干的黄维兵团，加上其他一些没有多大战斗力的部队。他希望看到这些部队的溃灭，更不愿将他已经掌握在手的部队调去解围，因为这是同他的企图相违背的。

第二十八军首先从鄂西开抵汉口，白崇禧就表示不让调走，经顾祝同亲自以电话疏通，白知道这个军的人事和顾祝同有着历史渊源，便勉强同意调走。跟着第二十军也开到了汉口，白崇禧利用这个军多系四川人，官兵不愿东调的情绪，唆使杨干才向国

防部请求免调，同时白亦向国防部发牢骚，说：“你们把部队都调走了，武汉还要不要”等一类的话，并命令运输司令部，非有他的命令，不许装运。国防部一再以电报电话催促，白都拒不执行，形成僵局。经顾祝同派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飞到汉口见白，并经许的老师徐祖贻（华中“剿总”参谋长）从中斡旋，白才答应让二十军调走。

现在轮到第二军了，第二军辖第九、第七十六、第一六四等三个师，还有炮兵团、输送团等，全军有四万人，全系美械装备，部队历史悠久，战斗力颇强，为蒋介石集团骨干部队之一。这个军于十二月八日后陆续到达沙市集结，待轮开汉。其先头部队的第九师，则已于九、十两日先后到达汉口，正拟装轮东运之际，白崇禧突派其亲信干部率其警卫团的武装部队将轮船看守起来，不许装运。国防部的电报，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硬梆梆地顶回去，任何好话疏解，都毫无效果。东线的战况是那样紧张，真是盼望救兵如救火一样，而武汉方面却是多方留难。这把蒋介石急坏了，便亲自拿起电话机同白崇禧通话。一开头双方态度还较好，蒋对白说明东线战况的需要，希让第二军即日东下；白则以武汉重要，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不能再调。说来说去，双方态度愈来愈坏，蒋骂白不服从命令；白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双方交锋了几个回合，一次电话讲了半个多钟头，毫无结果。蒋介石气得满面通红，胡子都翘起来了。他将电话机使劲往桌上一掼，用他那宁波土话，骂了一声“娘希匹”。白崇禧命令集结在沙市的第二军部队不许开汉，同时并命已经到了汉口的第九师仍开回沙市去。这样一来，其他的部队自然更不能调了。

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对我说：“这样吧，你还是回到沙市去，把鄂西、湘西地区好好经营一番，借以屏障四川。可在那边新成立一些部队，你去找顾总长、林次长商谈一下。”

白崇禧力阻第十四兵团部队东调，多方留难，最后不惜采取

同蒋介石决裂的态度，是有其深远的目的的。主要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他就可迫蒋去职，由李宗仁取而代之。当然，他希望多掌握一些部队作为政治资本的意图也是有的。

我这次到南京，自十二月一日到十二日，在这十二天当中，同蒋介石见面有七、八次。我十分留心地观察他的态度，他经常是神情沮丧、两眼疲乏、焦灼不安、完全丧失了信心而充满悲观失望的一副可怜相的面孔。过去那种趾高气扬，自命不凡，得意扬扬的神气，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十二月八日那天晚上的聚会，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富有戏剧性的一幕。黄维兵团的副司令官胡璉于八日上午从双堆集乘一架小飞机来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了战场的情况，说的都是坏消息，而没有一点足以使人鼓舞的事情。蒋介石除了空言的慰勉而外，拿不出任何办法来挽救危局，因为这时由徐州南下的杜聿明集团已被围困于陈官庄附近，从其他方面也无可调之兵了。蒋介石于当天晚上六时半约我和胡璉去吃晚饭，在座的还有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林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及蒋经国。饭后就在那相当宽敞的会客室里放映了一部《文天祥》电影片。放完后，蒋介石站起来向我们点点头，便低头沉思，缓步地走上楼去了。我们呆在一起三个多钟头，蒋介石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很似李后主“无言独上西楼，……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的情景。当时，我被这幕悲剧所感动，几乎掉下泪来，默默地走出蒋的官邸，坐在汽车上一路想着：“老头子多可怜呀！”

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我率残部直逃到西昌去，被解放军追上，围困于大渡河畔走投无路时，曾有过举枪自杀的意图，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正是这部《文天祥》影片的影响。

迫蒋下野

我于十二月十四日离开南京飞到汉口，住在跑马场附近的一

所楼房里。大约是十七日或十八日的早晨八时左右，我正在吃早饭的时候，一个副官慌忙地跑来对我说“总司令来了”（即白崇禧），我跑去迎接，他已经进到会客室了。他问了我的一些家庭情况后，便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谈谈。”我便和他同乘一辆车到了他家里。

他引我到 he 楼上的一间书房里，室内除一张办公桌一把圈椅和三张沙发外，墙上还挂满许多军用地图。坐下后，他吩咐侍从人员下楼去，并不要让人进来，然后他就对我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黄维兵团十多万人已被全部歼灭。这样，共军的力量更增大了。杜聿明所率的三个兵团恐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华北方面，天津已被共军占领，在北平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如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与共军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了。但要想同中共恢复和谈，必须请蒋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才有可能。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校系统的部队大部分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如能和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会商一番，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

白说完后认真地注视我的态度，并问我的意见怎样。当时使我处在一个很为难的境地。我本来是一个不会抽烟的人，这时燃起一支烟使劲地吸着；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答复他说：“总司令对战局所作的分析和判断，我是完全同意的。同共产党进行三年战争的结果，我们是被打垮了，稍为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我们是没有什么力量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的办法，当然很好，我也很赞成。总司令嘱我联合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劝蒋先生下野，本应遵办，但我考虑到：（一）我们和蒋先生有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这样做，在道

义上恐怕说不过去；（二）我们是他的部属，这样做，从军纪上来说，恐怕不大好；（三）陈明仁等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白说：“军纪问题、道义问题都是应该考虑的，但目前以顾全大局为主。如能用和谈的办法使我们获得喘息的机会，不致于被中共完全消灭，得以保存一部分力量并积极培养新的力量，则事尚可为。这样做，正所以爱护蒋先生，不要过分地从小节上考虑问题。”

我说：“我们能不能运用一些民意机关例如参议会等，由他们出来表示意见？”白说：“这当然是要做的，但恐作用不大。”随后白就蒋介石的任用非人，指挥错误，以及政治上经济上搞得一团糟等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几乎整整地说了两个钟头。最后仍回到主题上来，继续鼓励我，甚至可以说带几分胁迫性的意味，要我照他的意思去做。我说：“这个问题关系较大，请让我好好考虑一番再说。”时已十二点，我向他告辞。

离开白的寓所后，我没有回家去吃午饭，便径到袁守谦那里去（袁守谦那时任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是蒋介石派其驻在武汉侦察白崇禧的动态的），把白对我谈话的详细情形告诉他，由他负责向蒋报告。同时我们研商后，决定我当天下午就离开武汉回鄂西去，防备白采取激烈行动，并由袁负责向白解释。就这样，我于当晚悄悄地离开了汉口，取道长沙、常德回到沙市。

事情的发展，如大家所共知的：没有几天，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参议会相继发出电文促蒋下野，不久白崇禧亦亲自出面逼蒋去职。蒋介石在其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并在内部矛盾尖锐化的夹攻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通电宣告“引退”，并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职权。

溪口见蒋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我和白崇禧同机由汉口飞到南

京。大约是在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参谋总长顾祝同约我到他的公馆去，我刚跨进他的会客室，关麟征也跟着到来了。顾祝同对我们两人说：“你们到溪口去见见总裁，我已打电话给空军周总司令（周至柔），要他派飞机送你们去。”（究竟当时是蒋介石有电话给顾祝同叫我们去，还是顾祝同自己的意思要我们去见，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我和关麟征于是日正午搭乘一架空军运输机到了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这个学校这时已经大部分搬空了，满地都是遗落的器材书报等。我们费了不少的功夫才找到了学校的教育长胡伟克。这个一向性情活泼、谈笑风生的空军上校，这次见面，一点兴奋的情绪都没有。他劈头就说：“你们两位老大哥今天到这里来，既没有东西给你们看，也没有东西给你们吃，真是抱歉万分！学校奉命迁移台湾，已经大部搬完了。我们在一九三七年秋天曾被迫由这里转移到西南去，当时人人虽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但都满怀信心地认为一定会回来的。这一次搬家则完全不同了，大家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谁也不相信会有打回来的一天的。”他叫炊事兵弄了一些蛋炒饭给我们吃。约在下午三时，我们换乘一架小型的运输机，不到一小时，就飞抵奉化机场。俞济时亲迎接我们，同乘一辆小汽车行驶约半小时就到了溪口，把我们安排在武岭小学楼上的一间房子里。五时许蒋经国来邀我们出去散步，我们沿着小溪缓步而行，谈话很少。由于心情的沉重，也无心欣赏风景。当晚在蒋经国家里吃饭，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些问题，多半是三年来失败的原因，而对前途怎样办，得不出任何的结论。

第二天早晨七时，俞济时来说蒋约我们上山去吃早点并谈话。于是我们同乘一辆小汽车沿公路上驶约一公里多后下来，在松林中循着一条小石板路走上山去，走了约一千多步便到了蒋介石的住宅，是修建在丛树中的一栋小平屋。我们在会客室坐下不到五分钟，蒋介石进来了，和我们点首寒暄后，便带我们到屋后

去走走。出门后不到两百步，便是蒋介石母亲的坟墓，我和关麟征在墓前行了三鞠躬礼，蒋介石回礼并说“谢谢你们”。我们在后山一带散步眺望了一番，随即回来吃早饭。饭后，我们分别向蒋汇报了属于自己工作范围内及南京方面的一些重要情况。关麟征并谈到李宗仁征求他担任参谋总长职务的问题，向蒋请示。随后蒋介石向我们两人讲了一大段话，兹记述其要点如下：

（一）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象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旦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筋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乘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抗战期间，日军一个小部队，据守一个据点，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围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精神，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期间，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那时关麟征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

重大责任。

(二) 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党派及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对于我个人及国民政府，攻击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政府是如何地横征暴敛，说我是如何地有钱，说老百姓对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们党内也竟然有些人随声附和。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本党，本党同志不知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它，反而这样离心离德，实在令人痛心之至！你们是我的学生，也是和我共过多年患难的同志，你们万不可轻信旁人对我的毁谤诬蔑。不仅这样，听了这些话，就应该坚决地进行反驳。

上述两段话，是蒋介石这次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他以相当激动的态度和语调，反复地阐述这些意思，足足地讲了半个钟头，我也记不得那许多了。

蒋介石接着谈到外交问题，埋怨美帝国主义给他的援助不够，政策摇摆不定，以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大受影响。

最后，蒋介石说：“去年（一九四八年）我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职务，我是考虑到这样做有很大的伸缩性，我可以以党的总裁的地位来担负领导的责任，而可避开正面负责的地位，对党国来说，对个人来说，都有好处，可以说，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党内同志尤以一些老同志坚持反对^①，一定要我担任总统，结果因副总统的竞选问题，弄得党内

① 我当时曾参加那次扩大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他不愿担任总统的意见后就退席了。首先提出反对意见，坚决拥蒋登台的是CC派的潘公展、萧铮等人。刘公武发言主张接受总裁不任总统的提议，并剖析其利害。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便遭到CC派喽罗们气势汹汹的呵骂。戴季陶以元老身份登台发言，他几乎是以教训的口吻斥责主张“总裁不担任总统为宜”这一派人的意见。他力言就党的历史来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就党对国家的责任来说，都非蒋先生担任总统不可。这样，拥蒋登台派在会上占了绝对的优势。最后，通过一项决议，陈张群、吴铁城等五人向蒋劝驾，结果是蒋欣然接受，抱笏登场了。可见蒋介石当时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话，只是一种姿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后，恼羞成怒，转过来责怪当时劝驾的人。骂戴季陶于是年二月在广州服毒自杀，与此事有关，确否尚待查证。

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外对内，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可以总裁身份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反而要好得多。”

蒋介石讲完他原来准备要对我们说的一大篇话以后，稍为停息了一下，喝了几口白开水，接着对关麟征说：“我离南京前，曾和敬之（何应钦）、墨三（顾祝同）谈过，叫你担任陆军总司令，何以尚未发表？李宗仁要你当参谋总长，这是他们企图分化我们的一种阴谋，你不宜担任。你以任陆军总司令为适宜。”蒋介石随即对我说：“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渡江，今后西南地区极关重要。现在湖南境内的几个军，于必要时，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飞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以巩固川东门户。此事你回到南京，可和顾总长、林次长研究一下，并把我的意思告诉陈明仁和在湖南的几位军长。”

蒋介石说完后站起来打开会客室的门，叫站在门口的一个警卫去找俞济时来。没有几分钟俞济时就进来了，蒋介石嘱咐他编几本专用密本交我带去交给在湖南的几位军长。我和关麟征随即向蒋告辞，偕俞济时一道下山，约等了半个钟头，俞济时把三本密码本交我带给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第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第一百军军长蒋当翊，并要我对他们说今后可常和总裁直接联系。

上述这些情形，都是蒋介石形式上下野，幕后操纵一切的实际例证。

我们乘一架专机于正午在奉化机场起飞，下午一点多钟到了上海。商得飞行员的同意，决定在上海停留一夜，住在金门酒店。晚间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陈良来看我们。他原在军政部任军需署署长，和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他善饮酒，会讲笑话，任何一次聚会，有他在场，是不会寂寞的。但这次一见面就唉声叹气地

说：“完了完了，我们已被共产党打垮，人心已经完全丧失，国民党的气数快要告终了！”

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我们回到了南京，一同去见顾祝同，向他汇报到溪口见蒋经过。谈到关于关麟征任陆军总司令问题时，顾祝同说：“这件事，因行政院于二月初即迁往广州，还没有来得及提请通过。不料行政院搬到广州后，孙院长未和国防部商量，就由行政院通过决议，发表了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既已造成了这个局面，目前不便马上变更，只有暂缓一个时候再说。”因此，关麟征之任陆军总司令，延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才实现。在当时，陆军总司令一职，并无实权，尚且如此勾心斗角，可见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复杂和矛盾重重了。

和谈前夕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晚七时，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我也被邀参加了。宴会后，李宗仁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时仅两小时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林、萧两人当时都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汤恩伯（当时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刘士毅（总统府军务局长）、关麟征、宋希濂等共十二人。会议讨论了下列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由萧毅肃报告长江沿岸兵力部署概况后，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密防范共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作了必要的决定。

第二、将驻新疆部队东调。国防部提出，认为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新疆驻兵将近十万，在目前情势下，似无必要，建议将驻新部队的大部分东调。李宗仁、何应钦都表示同意，询张治中意见（张那时是西北军政长官）。张巧妙地答复说：“将驻

新部队东调，我不反对，但路程遥远，无论步行或车运；均不简单。最好由国防部电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京研商后，再作决定。”李宗仁接受张的意见，嘱国防部照办。（其后陶峙岳依据张治中的意旨，一再拒到京、穗开会，形式上接受国防部要驻新部队东调的命令，以要求大量开拔费为借口而拖延时间。随着形势的变化，尤以甘肃全省的解放，新疆部队遂于九月间起义投向人民。）

第三、十个美械师的分配。一九四八年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编组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军队，在各地设立了许多新兵编练司令部。当三大战役的序幕刚揭开时，蒋介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多方面拼命作垂死的挣扎。他于是年十月密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赴华盛顿接洽美援。郑介民在美活动了一个多月，得到魏德迈等人的帮助，获得了十个师的美械装备（这是郑介民于十二月从美国回来后当面告诉我的）。这些装备，于二、三月间陆续运到了上海及台湾等地。这次会议上，白崇禧提出要求分配给他四个师的装备，说他在广西有几个新兵训练处，在武汉有两个新兵训练处，兵员已大部征足，急待配备武器，进行训练。顾祝同则谓现时全国设立的新兵训练处甚多，大家都要求领发武器，此事必须由国防部按照实际情况，统筹配发。白崇禧借此大发牢骚，说：“过去许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队不发，不能打仗的部队倒发了，结果都送给了共产党。现在局面弄到这个地步，你还想操纵把持吗？”（白这番话是对顾祝同说的，实际是指蒋介石、何应钦等。）顾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进行反驳。一个坚持要四个师的装备，一个坚持不肯，相互间顶起嘴来，声音越说越大，意气愈来愈盛，弄得脸红脖子粗，大有互相辱骂甚至动武之势。何应钦看见情形不对，连忙劝他们两人不要争吵，说此事待他仔细研究一下，再请示李代总统决定。一场激烈的争吵，算是平息了。以后听说分给了桂系两个师的美械装备。

最后，李宗仁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散会了。从这个为时仅两小时的会议里，可以看出李宗仁高唱和平的假面具以及反动派内部狗咬狗的丑态。

我于和谈代表团飞北平后的第二天离开南京。这次在南京共住了十一天，也是呆在国民党政府都城的最后一次。在这十一天中，凡所接触过的人，除张治中对和谈还抱有几分希望和信心之外，其余都是一片悲惨的绝望哀鸣。例如二十年来为蒋介石所最亲信的参谋次长林蔚，向来是一个说话十分慎重的人，有一天我在他的办公室和他谈到前途的展望时，他摇头叹息地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是二十多年积蓄起来的精华，现在几乎被共产党完全歼灭了，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实际上就是叫我们投降，有什么和谈可言？我自当幕僚以来，很少携带手枪，现在我把手枪随时佩带在身，准备万一被共军抓住，我就自己了结自己。”又如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大革命北伐时期，我就和他在一个团共事，又是常在一起下棋的棋友，这次一见面就说：“老弟，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那样好的一个局面，想不到只有三年功夫，就会失败到这个地步，真是象做梦一样。”他站在空军总部的台阶上指着小营附近的一片新房子说：“这些都是空军几年来修盖起来的，有的尚未完工，现在得让共产党来住了！”言下不胜唏嘘感慨。

南京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称为新住宅区，数以千计的小洋楼是各式各样的，真是争奇斗妍，美轮美奂，除一部分属于外国使馆的外，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要人们的住宅，而这时，已是十室九空了。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一带，向来是南京最繁华喧闹的地区，在这一带的许多大旅馆上等餐馆酒楼茶楼，过去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盛极一时，现在则是顾客稀少，门庭冷落，一到傍晚，许多商店即已歇业，街上行人，屈指可数。我看了这一副凄凉的情景，自然而然地念起元代诗人萨都刺“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那首词来。我想，现在该

是七代了！

我和胡宗南策划的退却计划

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我从驻地宜昌到了南京，那时正是国民党政府派定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准备前去北平的时候。我和张先生见过三、四次，谈过好些问题，最后一次，是三月三十日晚上九时左右，我问张先生：“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战争是无法再进行下去了，您看我今后应该怎样办？请您指示指示。”文白先生说：“这次去北京，希望和谈能成功。我到那里后会有信给你，你等着我的消息好了。”但以后我再没有得到张先生的任何指示。（一九五六年张先生曾告诉我，他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有一封长信给我，但我没有收到。）这年七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攻宜昌、沙市，我将所部主力转移至巴东、野三关、五峰、渔洋关、慈利、大庸至沅陵之线，主要任务是屏障川东门户。这时国防部并发表我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当时我所指挥的部队，计有：陈克非的第二军，辖第九、第七十六、第一六四等三个师；刘平的第十五军，辖第六十四、第一六九、第二四三等三个师；方靖的第七十九军，辖第九十八、第一九四、第一九九等三个师；陈希平的第一一八军，辖第五十四、第二九八等两个师；张绍勋的第一二二军，辖第一六七、第三四五等两个师；顾葆裕的第一二四军，辖第六十、第二二三等两个师。以第十五、第七十九、第一二二等三个军编为第十四兵团，归兵团司令官钟彬指挥。其后，又以第二、第一二四等两个军编为第二十兵团，由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兼任兵团司令官。同时我还收编了湘西地方恶霸等所掌握的地方武装力量，计有田载尧的新编第一师，周燮卿的新编第二师，陈子贤的新编第三师，罗文才的新编第四师，汪援华的新编第五师，陈策勋的新编独立第一旅等。其后又收编了辰溪的张玉琳匪部，并以新编第一军的名义。当时

总兵力号称十七、八万人，实有力量约十四万人左右。这些部队，除第二军历史悠久，装备完善，兵员较足，是一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外，其余大都是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九年上半年以地方团队或师管区的新兵团编成的，装备既不好，训练也差，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至于收编的地方武力，更是乌合之众，纪律极坏。我深深地知道，以这样脆弱的军事力量，再加上政治上的散漫和腐败，是无法和解放军抗衡的。不能坐待歼灭，必须寻找出路。出路何在呢？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率部在湖南起义。头一天，陈明仁曾给我一个电报，劝我共同起义。我当时由于头脑里存在着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认为如投向共军，恐绝无容身之余地，加上对情况完全不了解，因而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和他采取一致行动，仅复了他一个“事关甚大，正慎重研究中”的电报，实际就是拒绝起义。程潜、陈明仁等起义后约四、五天，白崇禧在衡阳接见记者发表谈话说：“陈明仁率一部投向共军后，已被全部缴械，程潜、陈明仁均已被扣留，押送武汉去了。”我当时信以为真，还庆幸自己不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做得对。我所属的一位补给司令罗文山曾对我说：“仗是没有力量再打下去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左转。”我问他怎样左转法？他说：“秘密派人和解放军接洽。”我说：“我们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杀过他们不少的人，他们的报复心是很强的，而且手段很残酷可怕；投向共军，能容许我们生存下去吗？听说陈明仁投共军后，部队已全部缴械，陈明仁亦已被扣。很显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罗文山问我今后打算怎么办？我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过去共军采取的战法。今天我们力量弱了，不能和他们决战，也可以采取这种战法。最要紧的，就是要避免陷于被包围的状态。最近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如能把这十多万人拖到滇西去，背靠缅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致于被消灭就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能保存力量，以待国际局势发生变

化，则前途仍是大有可为的。”我继续说：“我们曾在滇西驻过好几年，对那边的地形、民情、物产等都是相当熟习的。最好以保山、腾冲、龙陵等县为根据地，凭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之险以阻共军的进攻。万不得已时，亦可退到缅甸的密支那、八莫、腊戍等地去。缅甸没有多大军事力量，他们是阻挡不住我们的。”我并向罗文山对我这个想法有什么意见，罗文山说：“这个方案很好，就恐怕国防部不同意。”我说：“那个以后再想办法。”这是我当时所考虑到的出路。

八月初我把我的司令部由巴东移到恩施，八月九日我由恩施乘飞机到了重庆，当晚会见张群（他那时是西南军政长官），并在那里晚饭。十日拜访了钱大钧、杨森等人，这天晚上我和在汉中的胡宗南通电话，约定翌日去看他。十一日下午一时，我到了白市驿飞机场，搭乘一架军用运输机，于下午三时左右到了汉中。胡宗南亲自到飞机场迎接我，随即一同乘车到了他的住所。在六时半吃晚饭以前，我和胡宗南、李文、李铁军、罗列等人只是随便谈谈，没有涉及具体问题。

自八时起，我和胡宗南单独会谈（有时罗列也来参加），一直继续到深夜两点多钟，足足谈了六个多钟头，在头一个多钟头里，我们谈的是国民政府二十多年的统治：在政治上，没有做出一点成绩，贪污成风，腐败无能，弄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经济上没有一点建设成就，而且弄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党务上更是一团糟，国民党员号称几百万，毫无组织力量；军队内部矛盾重重，中上级军官大多腐化堕落，士气消沉，指挥紊乱，认为上述种种，是三年来失败到这般地步的重要因素。接着我们提出了下列几个问题来讨论：

（一）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于短期内爆发？

（二）中国共产党内部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三）就目前形势，我们能否保有西南、华南、台湾等地？

（四）如果解放军向西南进攻，我们能不能和他们进行决

战？如果不能决战的话，应该怎样办？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短期内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英、法等国损失惨重，决非短期内所能恢复，这些国家当然不愿打仗。美国损失较少，但美国人民是不爱战争的。美国政府要想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非积极在舆论上动员，取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是不能轻举妄动的。美国一贯的作法，就是它出钱出枪，利用别人打，等到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它就出来拣便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现在如果再有大规模的战争，必然主要就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西欧许多国家都没有力量打，这些国家的人民，更是厌恶战争，渴望和平。西欧没有国家打头阵，美国要想组成五、六百万大军送到欧洲去同苏联打，是决不会干的，也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势下，短期内决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从未和共军接触过。在解放战争期间，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我在新疆工作，亦未参加。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及解放军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谈不出什么意见。胡宗南认为有这种可能，他的理由是：

（1）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团结，如张国焘等从延安偷跑出来，就是一个实例；（2）过去共产党内部整风，斗争很激烈，许多人受不了，常从陕北逃跑出来；（3）共产党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发展了许多游击根据地，各个地区都是各自为政，现在这些力量壮大了，必然想造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互相摩擦，互争雄长，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对他的话，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关于第三个问题，我们当时估计解放军正规部队约有四百万人左右，再加上地方兵团及民兵等组织，可能达到一千万人。认为中共拥有这样大的力量，必然很快就要向各地进军来统一全国。而当时国民党军队仅存一百多万人，散布在新疆、甘肃、陕南、四川、贵州、云南、湖南、鄂西、广东、广西以至台湾等广

大区域内，无论就军队数量和战斗力来说，都无法在任何地区进行决战，因而在整个大陆上——不论是华南或西南，恐都将保守不住。但认为台湾、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地，则可保持下去，或至少可以保存一个时期。因为解放军要进攻这些地点，必须有相当的海空军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成长，至快也要三、五年。我们知道，解放军当时是还没有海空军的。

关于第四个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谈的重点，讨论得较细致，花的时间也最多。

当时的西南地区，除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外，还包括鄂西、鄂西北及陕南地带。在这个区域内的部队，统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计有：在陕南、川北一带归胡宗南（名义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指挥的，有李文（第五兵团）、裴昌会（第七兵团）、李振（第十八兵团）等兵团，辖第一军（军长陈鞠旅）、第三军（军长盛文）、第十六军（军长冯龙）、第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第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第二十七军（军长黄祖勋）、第六十四军（军长胡长清）、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第七十六军（军长许良玉）、第九十军（军长周士瀛）、第九十八军（军长刘劲持），还有一个军的番号及军长姓名记不清楚。

（胡宗南当时告诉我，他共有十二个军。但听说以后又增编了几个军，内容不详。）归川东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指挥的有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辖四十一、四十七两个军。第四十一军军长由孙元良兼任，第四十七军军长原为杨希域，后为严翊。归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指挥的有何绍周的第十九兵团，辖四十九、八十九两个军。第四十九军军长原系何绍周自兼，后为王伯勋，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归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指挥的有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及由云南保安团队编成的新编第十三军（军长余建勋）、新编第十四军（军长龙泽汇）。归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所指挥的部队，上已开列，此地不重述。另外还有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接指挥的罗广

文兵团（第十五兵团），辖一〇八、一一〇两个军，一〇八军军长由罗广文兼任，一一〇军军长向敏思。其后又由郭汝瑰组成的第二十一兵团，辖第四十四、第七十二两个军，四十四军军长陈春霖，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兼。还有属于西康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军长刘元瑄），属于邓锡侯的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属于杨森新编成的第二十军（原有的二十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时全部消灭）。其余还有归长官公署直辖的几个独立师。加上四个省的保安队，总兵力约为九十万人左右。这些队伍，大部分都是新编成的，装备不全，尤其缺乏训练，战力脆弱。而散布在西南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当时除公路外，没有一条铁路，要想集结兵力在某个地区来进行决战，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力量进行决战，我们当时是充分讨论过和估计到的。在这约九十万人当中，我和胡宗南拥有的兵力，超过半数，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在西南的两张王牌。我们既然认识到解放军不久就会向西南进军，也认定了自己没有力量进行决战和阻止解放军的进攻，当然也不愿坐待消灭，必须寻找求生存的出路。不用说，我们当时谁也不会谈起向中共投诚的问题的。因而会谈的焦点，集中在如何避免被解放军包围以保存实力的问题上。当时我们经过相当多的时间商定了下列方案：

为保存实力，静待时机，必须设法避免使部队被共军包围消灭，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第一步应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的基地。第二步俟共军开始向西南进军时，应立即以主力转移至滇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一部转移至滇南的车里、佛海（即现在的西双版纳）一带。如将来再受共军压迫时，则以主力退入缅甸，以一部退到滇、缅、泰边境。为顾虑到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入境及敌对行为，必须具有击败缅甸军的决心和力量，因此在转移时，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保存现有的重武器如战车及重炮、山炮等。根据这个决策，商定由胡部设法抽调约

一个军的兵力开驻川南的乐山、峨眉、新津等县，准备进入西康；由宋部抽调一部分兵力开驻泸州，为将来主力经由盐津、昭通、会泽等地开往滇西作好准备。为使这个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应先解决刘文辉以控制西康，并以西昌作为第一个根据地。

这个方案，决定俟蒋介石于八月下旬来重庆时向他当面陈述。

这次会谈商定后不久，胡宗南便以训练新兵为名，开了两个师到川南的乐山、峨眉一带；我指派了第七十九军的新兵总队约四千多人开驻泸州训练，并暗示各军的后方留守可设在泸州。

应该坦率地说，我们这次商定的计划，主要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我在滇西住过三年多，对于滇缅边区的情形较为熟悉。当我向胡宗南说明这个方案的概要后，胡宗南曾从座位上跳起来拍着我的肩膀，兴奋地说：“老宋，这个计划好极了！好极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由台湾经广州乘飞机到了重庆，所有在西南方面军事、政治、党务的主要负责人，均陆续来到了重庆。大约是在八月二十八日的下午和八月三十一日的晚上，我和胡宗南相约到重庆山洞陵园去见蒋介石，向他委婉陈述我们在汉中商定的方案。但蒋介石坚不同意，他认为：（一）两广恐难保持，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二）如果在大陆上完全放弃了，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三）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以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必须努力保持这一地区，成为复兴的根据地；（四）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反共的态度是一致的，现在只要他们不在后面捣乱，应设法团结他们以安其心。

我们曾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解放军不久就会向西南进攻，如不过免决战，有被包围以致歼灭的危险，积极设法保存实力，实为上策等意见，向蒋反复陈说。蒋不仅坚不同意，而且最后面有愠色，这样，我们就无法再说下去了。因而这个计划也就搁置起来了。

两月之后，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解放军开始向西南大进

军。在毛主席的伟大军事思想指导下，采取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由刘伯承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杨勇兵团，以迅速果敢的行动，于十一月间解放贵州后，即西出毕节、泸州、宜宾、乐山，有力的一部并进抵川康边境的金口河、富林等地，完全截断了国民党军队退往西昌、滇西的去路，将胡宗南的全部以及由川东溃退的部队，彻底地聚歼于成都附近的盆地内，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批武装力量。

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情况极其紧张之际，胡宗南曾由新津空运了数千人占据了西昌。那时解放军尚来不及向西昌进军，因而胡宗南凭借这几千人的力量又在西昌呆了两个月。听说他在西昌时终日绕室彷徨，有时大笑，有时痛哭，常捶胸顿足，骂蒋介石为“老糊涂”。

蒋介石在重庆

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鄂西的宜昌、沙市及湖南的长沙、常德等地相继解放，白崇禧率桂系部队退据衡阳、邵阳一带。西安、宝鸡等地，亦于六、七月间解放，胡宗南率部退据秦岭及其以南地区。这时的西南，除川、康、滇、黔四省外，还应包括陕南及鄂西、湘西的一部分。在这个地区内，残存的反动武装力量，包括地方保安团队在内，共计约九十万人。军事指挥的首脑部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设在重庆，长官为张群。下辖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设在汉中，主任为胡宗南；川鄂边区绥靖公署，设在万县，主任为孙震；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设在恩施，主任为宋希濂；贵州绥靖公署，设在贵阳，主任为谷正伦；云南绥靖公署，设在昆明，主任为卢汉；西昌警备司令部，设在西昌，司令为贺国光；此外还有直属的罗广文第十五兵团等单位。这些部队除两三个军（例如第一军、第二军）装备较好，兵员较足，具有相当的战斗力的以外，其余都是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九年

上半年被人民解放军打垮了的残部以及一些新兵和地方团队拼凑编成的，没有什么战斗力。

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南这最后一个反共堡垒，实现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便卷土重来”的迷梦，于八月二十四日由广州飞抵重庆。他一下飞机，便发表谈话称：“今日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蒋介石过去每到一地，当地的党政军机关，总要强令一部分群众（主要是学生，其次是一些御用的团体）持旗列队前往欢迎。但是，自从他揭下假面具，发动大规模内战以后，由于西南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连这点强制力也失去了。当蒋介石那天带着蒋经国、黄少谷、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曹圣芬等由广州飞抵重庆的时候，重庆的国民党市党部和重庆市政府再无法强制青年学生出来欢迎，连平日御用的一些所谓“群众团体”也动员不了，最后只得由重庆的一些帮会的袍哥大爷如石孝先（石青阳的儿子）、田得胜、唐绍武、冯什竹等，出动他们的徒子徒孙去迎接这位出身于青帮的老头子。这批社会的渣滓，人数也是少得可怜的。自上清寺经两路口、七星岗、五四路到林森路，没有欢迎的标语，只有用白布写的什么、“拥护蒋总裁戡乱到底”、“欢迎蒋总裁来西南主持军政大计”等几个大字，欢迎的团体署名为“汉流”，在长达约四、五公里的马路上，稀稀落落地悬挂着。二十五日我由恩施飞到重庆时，看到这幅凄凉的情景，感到难过，觉得“太不像话了”，却不知从人心的向背得到启发，这也足以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是多么顽固！

蒋介石到重庆后，即电召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员到重庆来见他，并于八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上午九时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蒋介石、张群外，有刘文辉、邓锡侯、孙震、王陵基、谷正伦、钱大钧、胡宗南、宋希濂、罗

广文、何绍周、蒋经国、俞济时、邱渊（西南区补给司令）、程开椿（胡宗南部的补给司令）、刘宗宽（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兼第三处处长）、徐远举（第二处处长）、孙伯先（第三处副处长）、沈策（胡宗南的副参谋长）等人。首先由徐远举报告解放军在西北、华南各地的进展情况，同时强调西南地区的安定。继由孙伯先就西南长官公署所辖各部队布防情况和一些在后方整补的部队的情形，作了概要的说明。第三个发言的是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他十分浮夸地说胡宗南部守备秦岭地区有充分把握，并说必要时可向关中进击，收复西安；同时提出了胡部策应兰州出击陇南的军事计划。最后由蒋介石讲话，一开头他想安定大家的心理，说“目前局势已经稳定，形势即将好转”。是怎样的“稳定”，是怎样的“好转”，他却没有说出具体内容，只说：“过去有些人投降共产党，现在这些人都知道上了当，觉醒过来了，今后不会再有叛变投降的事了。”接着蒋介石就强调西南地区的重要性，大意和他飞到重庆后发表的谈话内容差不多。最后，蒋介石说：“有陆海空军的国家，是会被灭亡的。我们现在还有一百多万陆军，有相当强大的海空军，绝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望大家同心同德，坚定信心，坚持奋斗以争取胜利。”蒋介石讲话后，到十一时三十分会就散了，总共不到三个小时，既无议案，也无讨论。其实，在当时日暮穷途的局面下，这种会议，不能不只是形式的，也可以说是多余的。

蒋介石多年来对于部下，一贯是制造矛盾和运用矛盾，实行双线以至多线政策进行控驭。除了他自己的势力所不能控制的地区外，凡他所委派的方面负责人，军队自师长以上，行政自厅长以上，他总是要实行他的这一套政策，以防止某些人形成一种实力，尾大不掉，危及他的统治。这种实际的事例是很多的，他对于张群这样一个将近四十年的密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也并不例外。张群这次来到四川后，因为所有在西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均与他毫无渊源，所以他很希望能兼任四川省主席，并不甘于做一个空

头的西南军政长官。我于八月九日到渝见他时，他就曾对我表示说：“蒋先生调王方舟（王陵基号方舟）回四川来当主席，一年多了，王方舟个性倔强，态度生硬，四川人多称之为‘王灵官’，他和各方面都搞得不好，你和宗南的部队的补给，主要靠四川，王方舟能不能担起这个任务来满足前方的需要，我很担心。”由此可以看出张群早有撤换王陵基，由他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之意。蒋介石到渝后，刘文辉、邓锡侯和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等人正式向蒋要求撤换王陵基，并拥护张群主川，但被蒋介石坚决拒绝。同时，我还听说张群曾向蒋介石建议调换重庆市长杨森，并提出以曾扩情继任，但也未获得蒋介石的同意。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坚决维护王陵基、杨森呢？显然是想利用这些派系之间的矛盾来控制张群，控制四川各派系的军阀。

八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下午，罗广文（时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官）邀约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刘伯龙、郭汝瑰、陈春霖、向敏思、沈策、赵秀昆等十余人，到他的重庆办事处座谈并叙餐。大家交换了一些关于时局的意见，胡宗南主张由大家联名请求蒋介石长期驻在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获得一致的赞同，当即推郭汝瑰、赵秀昆（赵为罗广文兵团司令部的参谋长）两人起草信稿，经过讨论修改补充后就通过了。这封信约有七、八百字，原文我记不得，只记得大意分为三段。第一段说明解放军渡江后的形势与“中央”保卫华南、西南及台湾等地区的决策，第二段特别强调西南地区的有利地势，人力物力的丰富，巩固并充分利用这个地区的优越条件，使之成为反共复兴的基地，第三段请求蒋介石留驻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军事政治党务，使西南地区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奋斗图强，“国家前途，实深利赖”，等语。信缮正后，大家签了名，推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刘伯龙五人于第二天下午四时前往山洞陵园见蒋当面递交。

蒋介石看完了这封信，首先对我们发了一大套议论，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几百万党员特别是许多负责干部之“不能努力实行

三民主义”，接着便说：“我现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调训负责干部，由我亲自主持指导，如果局势稳定，将来大家也可轮流前往受训。这个学院能不能办好，关系本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西南方面，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撑持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就一定会有变化，到那时，我们就可和台湾方面的力量配合起来进行反攻，以争取最后胜利。”蒋说完后，我们几个人也相继说了一些意见，主要的意思仍然是说明请蒋留住四川的重要性。最后，蒋介石只表示说：“以后我可常来四川，希望你们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各军师团长。”约一个多钟头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下面我想谈谈我和蒋介石几次谈话的情况。

我于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半由恩施乘飞机到了重庆，十一时即到山洞陵园去见蒋介石。蒋在他所住的一栋小平屋的走廊上接见了。我向他报告我所指挥的部队自宜昌、沙市撤退后的情况并说明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军队粮食补给困难，致使前线部队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影响士气。蒋嘱我找钱大钧商讨解决办法，随即问我：“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叛变，你事先知道否？”我答：

“不知道。”又补充说：“当事情发生后，我立即查问电台和陈明仁兵团的电台是否尚可联络，电台答复说还可以，我就即刻发致陈明仁一电探询真相。第二天得陈明仁复电，中述他脱离中央，投向共军的原因，并希望我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我复电拒绝。以后就再没有联络过了。”蒋连声说：“好！好！”谈到这里，谷正纲进来了，蒋介石因为有事，叫我再约时间面谈。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蒋介石又把我叫去谈话。他要我把我所指挥的几个军的军长师长姓名、籍贯、军校期别及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向他汇报。我逐一地作了答复，并把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和指挥能力，也概要地加以说明。蒋介石听了，脸孔上显露着相当满意的表情。接着他说：“我们和共党是势不两立，共产党得势，我们这些人是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你要告诉各级干部，尤其

是高级干部，要人人抱定为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蒋介石这番话，充分透露出他在临近末日之际那种垂死挣扎的绝望心情。

蒋介石这次召集好些将领到重庆来，除开过一次毫无内容的会议和个别接见询问情况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好些人都很感到失望，例如罗广文就曾对我说：“这次总裁来，我们以为一定有些新的消息，新的办法，但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吗？”会也开过了，见也见过了，钱大钧通知大家说：“奉总裁指示，各将领没有事的就可回去了。”我于九月二日飞返恩施的前一天，到山洞去向蒋介石辞别时，他又重复了他那套空洞无物的话。老实说，我当时口虽唯唯，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蒋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对他这套话真有听厌了之感。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所以我于川东军事失利后，便产生了和蒋介石及国防部断绝联系，想率残部退到滇缅边区去的行动，后面我将详细叙述。

美国参议员的诺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我在解放军着着进逼之下，退到川东武隆县境的江口镇时，大约是在二十一日晚（日期记不确切）曾挂电话和在重庆山洞的蒋介石侍从秘书曹圣芬通话（曹与我的三哥在中央政治学校同学，又同是湖南人，我和他的交情很好），向他询问情况，并问在目前这样严重局势下：“总裁（指蒋介石）如何决策？”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昨天来到重庆见总裁，是由夏武官（夏为浙江人，留学美国，是蒋介石的侍从空军武官）当翻译的。诺兰向总裁表示，希望国军能在大陆上支持六个月，当由美国出兵支援。诺兰并表示，如果苏联出兵支援中国共产党，因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是有决心和力量打这个仗的。”曹圣芬又说：“现在希望前线能顶得

住，刻正调胡宗南的部队来重庆，如果能守住重庆几个月，就会有办法了。”

当时蒋介石的确相信诺兰的话，幻想死守西南，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

自解放大军向西南进军后，据守在陕南、川北的胡宗南恐被包围歼灭，力主将部队退往西昌、云南一带，万不得已时，退往滇緬边境，但蒋介石坚不同意。当川东局势紧张时，蒋急令调胡的骨干部队第一军来重庆，并征集了四百辆汽车去广元接运。胡宗南极不愿意，向参谋总长顾祝同请求勿调，并故意延缓部队行动。蒋介石很恼怒，亲自挂电话与胡宗南通话，在电话中彼此竟至争吵起来。结果第一军只调了两个团运到重庆，在市区耀武扬威地游行一番，想借以安定人心。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顾祝同等逃到成都后，胡力主迅速退往西昌，蒋则要他死守成都。争议未决，而解放军已由贵阳出毕节，相继解放泸州、宜宾，并进至乐山、蒲江、邛崃等地，截断了胡宗南军向南逃窜的去路，结果胡部三十多万人几乎全部被歼灭于成都附近地区，仅有数千人逃到了西昌（大部分是空运去的）。胡宗南乘飞机逃到海南岛后，蒋介石又严令他回到西昌，要他在西昌死守三个月。

不难看出，蒋介石之所以要胡宗南守重庆，守成都，守西昌，诺兰对他所作的“诺言”，显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异想天开的“反攻”

我于九月二日下午飞回恩施后，九月中旬某日（确切的日期我记不清楚了），顾祝同偕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许朗轩、第二厅副厅长（忘其姓名）及后勤方面的人员等飞到恩施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参加者除顾祝同及同来的几个国防部高级人员外，有我和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及本部参谋长、副参谋长，第二、第三、第四处处长，补给司令等。首由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就一份三十

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报告国民党军及解放军的位置（国防部第二厅对于解放军的行动，并无正确的情报来源，只是根据无线电测向台来判断解放军各军的位置）。继由许朗轩发言，说共军兵力相当分散，是我军反攻的良好时机，国防部决定命华中白崇禧所部向湘潭、长沙一带反攻，命退集到福建及沿海一带岛屿的汤恩伯部反攻福州等地，命胡宗南部自秦岭向陇海路西段进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所指挥的部队，应以主力渡过澧水，向常德、澧县等地攻击，以一部向宜昌附近攻击——这是赋与我的反攻任务。最后顾祝同发言，说明这次反攻对政治和军队士气有重大影响，希望各部队切实执行国防部的计划。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反攻的力量呢？所以我在会议上一言未发。我部的一些幕僚人员提出了关于派空军配合作战及补给等问题，并未获得具体解决办法。会议历时两个多小时结束。

午饭后，我请顾祝同到我的卧室里休息，顺便问他广州方面的情形。顾说白崇禧、薛岳等和他捣乱捣得厉害，对于军队部署等问题，牵制掣肘，事情很难顺手；解放军主力现在江西，似有越过大庾岭进攻广州的企图，形势殊难乐观，只希望西南方面能多撑持一个时期。约在午后四点多钟，顾祝同等一行离开恩施飞往重庆去了。

顾祝同走后，我立即召集部下开会，一致认为部队在宜沙一带被解放军击破，退到鄂西一带山地，尚立足未稳，加以有些队伍残破不堪，收容整顿也需要一个时期；而补给又是这样困难，实不具备进行反攻的条件。经反复研讨，决定令飭第十四兵团所属之第十五军派一个团的兵力向慈利作试探性的攻击，第一二二军派若干小部队渡过澧水，从事袭击扰乱；令飭第二十兵团（兵团司令为陈克非）派出约两个团的兵力，从巴东、野三关地区向当面的解放军作试探性的攻击；其余各部队应积极整顿补充，并构筑工事。以后这些担任行动的部队，由于受到解放军有力的回击，未获得任何成果，而渡过澧水骚扰的小部队，多半被解放军

所消灭了。

至于汤恩伯、胡宗南两部所谓反攻的情况是：福建方面，解放军已肃清福建大部分地区的国民党军，迫近在福建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厦门，汤恩伯本人逃到台湾去了，其残部逃窜到沿海岛屿。胡宗南派了一部分队伍偷袭宝鸡，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被解放军乘机突破了秦岭防线，打开了通向汉中的门户，迫使胡宗南的部队不断向川北地区龟缩。

据顾祝同告诉我，这次反攻方案，是白崇禧提出来的，而且他主张最力。当时白崇禧退据在湖南的衡阳、宝庆一带，拥有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第四十六军、第五十六军、第一二六军共五个军的桂系部队，其中第七军是桂系军阀北伐时期的老底子，第四十八军则为一九三二年编成，曾由白崇禧亲任军长。这两个军的军官百分之九十是广西人，兵员亦以广西人为多，战斗力较强，白崇禧并利用封建关系维持其绝对的统治，是桂系军阀部队的两张王牌。除上述五个军外，还有黄杰的第一兵团所属的第十四军及七十一军。八月间解放军四野部队曾有一小部进抵湘乡县属之永丰镇附近，已渐接近宝庆。白崇禧调集数倍的兵力，向这部分解放军攻击，解放军自动撤退。白乃大肆宣传，说什么“永丰三大捷”，极力夸耀桂系军阀部队的战斗能力，认为共产党的军队打不过他的广西部队，因此在那样微妙的形势下，大唱其反攻的论调。但是这位自命不凡、专好玩弄权术的军阀，他的所谓反攻尚未有具体行动之前，解放军就以神速勇猛的行动，向盘据在衡（衡阳）宝（宝庆）地区的桂系部队进行扫荡，在数百里的疾追中，经四昼夜的激战，将桂系的所谓王牌部队——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的主力，聚歼于衡阳西南的山区。白崇禧经此沉重打击，吓得惊魂落魄，自己乘飞机逃到海南岛，叫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率桂系部队及黄杰所部第一兵团、刘嘉树所部的十七兵团和余汉谋部的残余部队，东出粤桂边境，企图打通雷州半岛的出路，以实现他的所谓“确保左右江，屏蔽昆明，支援海南，以争

取外援”的方案。但在解放军的英勇堵击和风驰电掣、连续不停的猛追下，所有桂系部队及黄杰、刘嘉树等部，一举被聚歼于粤桂边区的国境线上，除黄杰兵团的残部约一万人窜入越南，刘嘉树兵团约五千人逃往云南外，几无一漏网。

当时残存在西南的国民党军，大多残破不堪，或者由一些地方团队和新兵临时编成，加上一些地方军阀的部队，都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而且散布在北起秦岭、南至昆明的广阔地区里，是不可能在任何地点打一次象样子的仗的。人民解放军无论向那一点进攻，都可迅速击破，是毫无问题的；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国民党军逃窜到西藏或国外去。当时胡宗南部三十多万人驻在陕南、川北一带，孙震、宋希濂两部共约二十万人驻在鄂西、川东一带，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是以保卫四川为核心的。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首先以二野的杨勇兵团击破国民党军在湘西芷江地区的微弱抵抗后，迅即进入贵州，于十一月中旬解放贵州省会贵阳，除派一部扫荡贵州境内残敌外，主力西出毕节进入川南，相继解放泸州、宜宾、乐山、自贡等地，并进出于成都以西之邛崃、大邑一带，截断国民党军入西康逃路。与此同

十月间将兵团司令部推进至荆门，到十一月初，因淮海战役的序幕战揭开，蒋介石将我所指挥的二十军、二十八军东调，情势急变，我的兵团司令部于十一月底又开回沙市。一九四九年二月解放军攻占荆门，有一部数千人有自当阳进攻宜昌的模样，原驻宜昌的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惊惶失措，立即率其公署人员乘船撤往巴东及三斗坪等地。我闻此消息，即命第二军及第十五军分两路自沙市西北地区向当阳前进，我自己亦乘军舰到了宜昌。局势稳定后，我派员到三斗坪请孙震回来，但孙不肯来，并乘船上驶，撤往万县。国防部乃于三月间发表我为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划湘西鄂西地区归我负责。于是，我乃将司令部移驻宜昌，并将十四兵团司令官一职交由钟彬接替，仍归我指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所载张治中先生《北平和谈前的几个片断》一文中说：“譬如宋希濂要逼走孙德操（即孙震），自己移驻到宜昌去，便说是奉了他（指蒋介石）的电报，以后孙到重庆便很愤慨地告诉萧毅肃，由萧传了出来……”孙震当时离开宜昌的经过事实，确是如此。孙震那时最感苦恼的是，名为绥靖主任，实际上却是一个无兵司令，我的兵团在他的绥靖区内活动，但国防部并未叫我归他指挥，这样，当我到宜昌后，他自然不愿回来了。此事是当时的军事形势造成的，并不是我有意识地要逼走他的，蒋介石也没有给过我电报。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解放军向宜沙进军，并已在沙市下游渡过长江，我乃下令放弃宜沙，向巴东、五峰、石门、慈利、大庸之线转移；八月初司令部移到鄂西的恩施。八月中旬，国防部发表我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直到十二月底解放时为止。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在沙市组成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后，国防部及华中“剿总”先后命令拨归我指挥的部队计有：陈克非的第二军，刘孚的第十五军，杨干才的第二十军，刘秉哲的第二十八军，李振的第六十五军，方靖的第七十九军，张际泰的湖南保安

第一旅。到十一月，第二十军、第二十八军调往淮海战场，第六十五军原驻陕西宝鸡一带，由于胡宗南坚持不放，始终没有过来。这样，就只剩下三个军及一个旅了，而第十五军全系由南阳地方团队组成的，装备和训练都很差。我为了扩张势力，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间，先后向国防部建议编组了两个军（每军两师，共四个师），即：以原湖南省保安第一旅改编为一个师，番号为二九八师，仍以张际奎任师长；以鄂西师管区的两个新兵团为基干扩编成为一个师，番号为五十四师，派董惠任师长；以上述两个师编为一个军，由原任湖北省保安副司令陈希平担任军长，番号为二一八军，驻恩施、建始一带。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国防部授权给我成立一个师，番号为二一七师，派谢淑周任师长，在湖南省军管区接收一批新兵并自行募集一些编成，原驻南阳第十二绥靖区司令王凌云自南阳南撤时，带来南阳附近地方武装褚怀理等三个纵队共八九千人，纪律极坏，在松滋一带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派部队将这三个纵队解散，调换大批干部，改编为一个师，番号为三四五师，派黄鼎勋为师长。有了这两个师后，我又向国防部建议编为一个军，番号为二二二军，由张绍勋担任军长，驻在湖南的石门、慈利一带整训。原驻在宜昌的六十师，本是归川鄂边区绥署孙震指挥的，但该师师长易瑾是我多年的部属，所以和我常有联系。另外还有一个师，番号为二二三师，师长为陈瑞鼎，驻在秭归以北一带担任警戒。白崇禧那时和我的矛盾日益尖锐，他想抓住这两个师来牵制我，乃向国防部建议将这两个师编成一个军，并保荐他总部的副参谋长赵援为军长，番号为二二四军。三月间我到宜昌后，国防部命令这个军归我指挥。至此，归我指挥的部队，就有第二、第十五、第七十九、第一一八、第一一二、第一二四共六个军的番号了。钟彬原在广州任第四编练司令，国防部发表他为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后，他于四月间来到宜昌，我将十五军、七十九军、一二二军编为第十四兵团，并指定该兵团司令部驻在宜都。及到八月间

部队自宜沙一带转移到巴东、野三关、五峰、石门、大庸之线后，九月初我又得国防部同意，将第二军和一二四军组成为一个兵团，以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兼任兵团司令官，番号为第二十兵团。另外我又于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大力收编湘西地方武力。此种地方武力大都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平日作威作福，欺压人民。这些恶霸势力知道共产党一来，将无他们存在的余地，因此深感危惧，纷纷派人或亲自来宜昌和我接洽，要求给予名义，并酌量补充弹药，主食由地方筹给，副食请中央补助。我知道这些人不可靠，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我想利用这些力量，使他们在解放军向我进攻时能起一些扰乱和牵制的作用。于是我答应收编，条件只有一个：凡受收编的，必须开到我所指定的地点集合，经我派人点验人数武器后，才能发给副食费，并酌量补充弹药。大体商定后，经我先后收编的，计有：田毅龙的新编第一师，周燮卿的新编第二师，陈子贤的新编第三师，罗文才的新编第四师，汪援华的新编第五师，陈策勋的新编独立第一旅。其后又给辰谿张玉琳匪部以暂编第二军的名义。并于六月初召集他们及湘西的一部分县长到常德开会，会商他们的驻地、补给及整编等问题，我在会上号召他们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共军的进攻，不要再自相残杀，否则将同归于尽。

我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要积极扩编部队，扩张势力呢？除了认为要对付解放军的进攻，必须有力量这个主导思想外，还有一种思想也占相当重要地位，所以我想附带谈谈。自北伐至抗日战争的初期，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人事上的升迁调补，基本上还是相当平衡的，即是说，除了极其个别的外，所有升调起来的人，一般都是基于他的战功和在部队有相当时期的作战和带兵经验。及到抗日战争中期，这种平衡就打破了。蒋介石师心自用，他害怕这些日益扩展起来的嫡系力量，有些人兵权过大，会对他不忠诚，于是他就开始把兵权寄托在他认为对他最忠诚可靠的几个浙江人身上，这就是陈诚和胡宗南，其次是汤

恩伯。不到几年功夫，陈诚以第十八军的第十一、第十四两个师为基干发展到几十师，胡宗南以第一军的第一、第七十八两个师为基干发展到几十个师，汤恩伯以第四、第八十九两个师为基干，也有相当扩充。同时，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种论调，说是只有作战经验而没有很好的战术修养的指挥官，是不能对付日本军队的，这样，凡属是到过所谓陆军大学镀过金的人就很吃香，晋升很快。这些人有的原只是上尉或少校级，在陆大经过三年的书本知识的学习，一毕业出来，就一跃而为少将的，比比皆是。这样一来，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不平和怨愤一天一天地增长。一九四三年关麟征在昆明和蔡斌大吵大闹，气得陈胃疾突发，吐出一脸盆鲜血，形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之间的斗争的高潮，这件事主要就是因为人事迁调问题而闹起来的。由于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人大权在握，他们的部队的干部升迁很快，而其他部队的干部升调的机会较少或较缓，就必然影响到部队的意志和士气。尤以一九四六年陈诚以国防部参谋总长的身份，几乎掌握着军队的全权，他借整编为名，尽量排除异己，这对于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内部意志涣散，士气低沉，是有重要关系的。

我对于蒋介石宠信浙江人把持一切（包括军事、政治、党务、财经、特务等）的作风，也早怀不满，因此想抓住这个机会，造成自己的势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到南京，曾对林蔚（参谋次长）、毛景彪（第一厅厅长，主管人事，两人都是浙江人，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郑重表示说：“要想使军队发挥力量，内部的团结和意志的统一，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个团长或师长，他自以为另有靠山，在军队里对上级不服从或阳奉阴违，这怎能把仗打好呢？我希望国防部今后对人事不要控制得太严。我们所保举的人，都是总统的学生，都是在军队里出生入死干过多年的人，希望对他们寄予信任。”经过这次交涉，加以在那样危机的关头，他们想要控制也就控制不了了。因此，我所扩充的部队的军师团长，几乎全是我所保荐，这些人大多和我共事过多年，我了

解他们，他们也了解我，在指挥上就比较便利些。

我和白崇禧的矛盾

淮海战役开始后，白崇禧曾一度劝诱我和他一致倒蒋，因为我没有答应，他对我自然是感到十分恼火的。他对于我的重回鄂西，极感不快，多方设法打击我，最突出的表现在下列三个问题上：

第一，当三月间我指挥第二、第十五两军向宜昌前进时，他闻之极为震怒，立即亲自打电话给我，询问我为什么派兵去宜昌。我说：“根据宜昌六十师师长易瑾的电报，当阳共军有六、七千人正向宜昌前进，孙震已率其公署人员退往三斗坪、巴东等地，并下令要他破坏宜昌电灯厂，商民环请不要破坏。他问我应如何应付，我已复电叫他沉着固守，立即派兵来援，电灯厂不要破坏。宜昌是川东的门户，是鄂西部队粮弹补给的基地，宜昌若失，对本兵团影响甚大，所以我派兵前往支援。”白崇禧说：“襄阳、荆门一带，尚无共军大部队集结情形，依情况判断，当阳的共军只不过是一些土八路，顶多两三千人，不会有六、七千人，六十师一个师在宜昌，足够应付，你不必派兵前往。”我说：“我希望总司令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万一宜昌竟为共军所占，一方面迅速渡江截断我兵团的退路，一方面使四川运来的粮被阻断，这样，问题是很严重的。”白说：“一切我负责任，你照我的指示，不必派兵前往。”我说：“我们研究一下。”这次通话，是那天下午六时左右（日期我记不确切），我深知白崇禧要阻止我去宜昌的企图，经过再度思考后，决定不听他那一套，命令部队分两路星夜向宜昌前进，同时叫第二军第九师留下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团，随我同行。这天晚上，一直到深夜二时，白崇禧亲自打来三次电话，我都不接，叫副参谋长罗开甲和他周旋。白问我到

哪里去了，罗开甲告诉他，说我已随部队出发。白听了暴跳如雷，大声对罗开甲说，“我叫宋司令官不要派兵去宜昌，为什么不听话呢？”罗低声下气地向他解释，他仍然很生气，叫罗开甲派汽车去追我，并命令部队开回来，罗唯唯。其实这晚我并没有走。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叫第九师那个团登上一艘兵舰和另一只火轮，装载完毕后，我和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坐上兵舰上驶。路过枝江，我们上岸去看王凌云^①。不料他竟误以为我们是去抓他的，听说我们来，便从司令部后门溜走了，一直溜到重庆。我们到处找他找不着，只得怅然上船西行，于当日傍晚到达宜昌。

六十师官兵闻我们到来，十分兴奋，隔了两天，由沙市和十里铺分别向宜昌进军的部队，大部分抵达宜昌外围。原来在当阳的解放军，兵力并不大，闻我军向当阳、宜昌前进，他们便撤往远安去了。我到宜昌后，即派人往三斗坪欢迎孙震回来，他不肯来，我便将经过详细情形电报国防部，不久，国防部发表我为“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并指定司令部驻宜昌，另命孙震的司令部改设在万县。

白崇禧极力阻止我的部队开往宜昌，是有他的打算的。自一月二十一日蒋去李代后，桂系的主要企图，是希望至少能保有两广及西南地盘，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援下，来和共产党抗衡。桂系早就派了代表到四川、云南等地积极活动，拉拢地方军阀势力。而白崇禧迫不及待地国防部提出以六十师、二二三师合编为一个军，并要他的心腹赵援担任军长，即为他整个阴谋的一着棋。因赵为四川人，活动能力颇强，白要赵到宜昌来，原想要他负责拉拢孙震及四川的一些小军阀，同时扼住宜昌这个咽喉，以阻止

^① 王凌云是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他率部由南阳南撤后归我指挥，到江陵、沙市时，我和他商定将能作战的部队第二、第十五两军留在江北，不能担任战斗的部队，移驻江南，由他负责整训，他满口同意，其实他思想上认为我剥夺了他的指挥权，满腹猜疑和不满。

我的兵团背靠四川，脱离他的控制。当赵援任一二四军军长的命令刚一发表，我即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专人送交宜昌六十师师长易瑾，嘱他小心应付，尤其要能确实掌握部队，不要予赵援以可乘之隙。因易瑾跟随我近二十年，我认为是可以信赖的。

第二，白崇禧没有能够阻止我去宜昌，不用说，他心里是很怀恨的，决不会就此干休。自我移驻宜昌后不到半个月，他就派来一个人数颇多（二十余人）的情报组到宜昌来，专搜集我部情况并进行挑拨离间的活动，都被我发觉，加以制止。到五月间，白崇禧更为凶狠的一着又拿出来了。他接连来命令电调我所指挥的第二军开到长沙去。我所指挥的部队，虽有六个军的番号，但第二军实为这个集团的骨干，因该军系美械装备，兵员较充足，历史较悠久，战斗力颇强，其余各军多系新兵编成，或残破不堪（如七十九军）。白此举是对我实行釜底抽薪的办法，可谓恶毒已极。当第二军先头部队开始向长沙方面行进时，我邀驻在枝江的第十五军军长刘平（刘原在第二军，与陈克非共事多年，两人感情素洽）乘一只小兵舰赶到湖南津市，我们三人在津市商会主席金某家商谈了很久，谈话主要内容大体是这样的：

我说：“去冬白崇禧力阻华中部队东调增援徐蚌，目的就是希望中央部队在徐蚌地区被共军消灭，然后逼迫校长去职，由桂系出来掌握大权，他们的第一步目的是达到了，他们本想和共产党讲和，做到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对峙的局面。由于共方的条件，他们不愿接受，结果是共军渡江，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相继陷落，他们的第二步目的没有达到。今后桂系的主要打算，是想保有两广及西南地区，来和共军抗衡。在这个目标上，我们和他们是一致的。但桂系既然取得领导权，他们对于以军校同学为骨干的部队，必然会要采取分化、削弱、打击等方法，我们现正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也是黄帝的子孙，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是校长可信托的将领。现在国家存亡，百姓祸福，我们都有责任。处在现在这样一种局势，是一种非常时

期的局势。在这种时期，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处常，一是应变。”

陈克非问：“怎样叫处常，怎样算是应变，我还不明白。”

我说：“如果是应变的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既然了解了白崇禧的阴谋，是分化我们，削弱我们，那我们就应该有所警惕。白崇禧把第二军调走，是想削弱我这方面的力量，借此来打击我，这个企图是很明显的。但依我看，对第二军也是不利的，共军如再南进，白崇禧一定缩回他的老巢广西去，那时他必然要第二军同去，将来受他完全控制宰割，岂不是毫无代价地枉做牺牲品吗？至于说到处常的话，那就只好是唯命是从，照命令行事罢了。”

陈克非进一步问我：“司令官对现在这种局势，是主张采取哪一种态度呢？”

我说：“事情很明白，我这次邀同谔青兄（指刘平）特地赶来津市和你会晤，就是希望我们共同研商后，对白崇禧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一句话，第二军不开去，看他又能对我们怎样？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应变。”

陈克非说：“我现在懂得您所说处常、应变的意思了。我决定两种态度兼而有之。对司令官和对总统是处常，对其他决取应变，但是要请司令官对上负责，不然我的应变就会变不成，甚至会使自己的脑袋搬家。我立刻下命令叫部队停止下来，不向长沙进发，作为跟随司令官应变的兑现。但要求绥靖司令部补发给我一道不出发的命令。我相信自己能对司令官负责，同时也请司令官要为我负责。”

本已出发的第二军部队在中途停止了，白崇禧得知这个消息，简直气得发疯了。他多次打电话到宜昌找我讲话，而我又不在，于是他向国防部大吵大闹，说我无法无天，不听指挥，要求撤办我。参谋总长顾祝同知道把第二军从我那里调走是不合理的，但在桂系的胁迫下，弄得毫无办法。当我由津市回到宜昌

时，看到他接连打来的几个电报，要求我容忍，暂时作出些牺牲，让第二军开到长沙去，否则难以应付这个局面，词极恳挚。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听从顾的意旨，使命第二军继续向长沙开去。当第二军先头部队到达宁乡，主力到达常德附近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国防部根据空军的侦察报告：“襄樊一带发现有共军大部队集结情形，并在襄河作渡江演习，判断似有南下攻略宜、沙，渡过长江的积极企图。”因此，国防部立即命第二军开回宜昌。仍归我指挥。这时，白崇禧也不再说什么了。

第三，我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白崇禧派其心腹赵援任第一二四军军长的阴谋，事情的发展，果如我所预料。赵援到任后，他知道六十师师长易瑾和我的历史关系，不易入手，便积极拉拢二二三师师长陈瑞鼎，并进行挑拨离间，说什么“宋希濂将来一定要把二二三师吃掉的”等一类的话。陈瑞鼎属于陈诚派系，部队经验不够，统驭能力较差，所部纪律不好，宜昌、秭归一带老百姓很不满意，我曾批评过他，因此他可能受了赵援中伤的影响。六月中旬，解放军解放宜昌、沙市后，主力向常德方面去了，只有一小部向西追击。那时我的司令部先退到巴东，随后移驻恩施。约在八月上旬，赵援事先没有任何报告，竟乘一艘中型轮船并装载其直属部队千余人，企图通过巴东上驶，同时他指示二二三师自秭归沿长江北岸逐步后退至川鄂边境。我得知此消息后，立派高级参谋张振武前往巴东阻止。赵援不愿接受劝告，仍企图上驶，当命驻巴东部队截留该轮，并将赵援扣押解送到恩施。二二三师接受了劝告，停止向西后撤。我乃命该师渡江到巴东附近集结，随将详细情形向国防部报告，并建议将赵援撤职，保举顾葆裕接充一二四军军长，将陈瑞鼎调为副军长，以陈振仙继任师长，均经国防部同意。赵援解到恩施后，我曾亲自审问他。他一见我，就跪在地下，要求饶命，并一再声称他上了白崇禧的当。他说白赋予他的秘密任务，就是拉拢孙震，分化宋希濂集团，好些计划都没有能实现。这次是想偷越巴东，退到川东去，与孙震合作，

由白崇禧支持他另成立新的队伍云云。在赵援被押期间，白崇禧亲自从衡阳打电话给我，为赵援讲情，希望我从轻发落。在我的司令部里有几位高级幕僚，主张杀赵援以报复白崇禧，我没有同意这种意见，很快就将赵援开释了。

自从宜沙地区撤退后，我将部队（有部分在宜沙战役中被歼灭）转移到巴东、野三关、五峰、慈利、大庸之线，背靠四川，白崇禧对我部已难以控制。到八月初国防部下令变更指挥系统，将我所指挥的部队统改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这使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将近一年的时间，和白崇禧的矛盾斗争，至此基本上告一段落。

最高决策委员会

我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曾到汉中和晤胡宗南，对全盘形势进行了反复的分析研究，一致认定必须避免和解放军决战；在解放军尚未向西南大举进军前，将胡、宋两部主力分期分批撤往滇缅边境，借以保存实力，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此项计划为蒋介石所坚决拒绝。九月中旬，我在恩施、巴东等地先后和十四兵团司令钟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及部分高级幕僚商谈今后出路问题，认为不能和解放军决战的看法是一致的。大多对前途充满着悲观的语调，尤以陈克非更直率地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三十年完蛋了，我看以我们校长为首的黄埔系统，也是快三十年了，看来也是快完蛋了。三十年一个轮回，这是天命，也是气数。”（这种迷信思想，在反动派的大批人物中是相当浓厚的。）

九月下旬，所谓“黄埔非常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当年春蒋介石指定袁守谦等人组织起来的）派徐会之、阮齐两人来恩施传达这个会的宗旨，潘佑强亦同时前来。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我在中学时的老师熊梦飞，及川东西阳区专员虞贡廷等人也

都来到恩施，和上述诸人及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委员朱怀冰、民政厅长彭旷高等，作了几次座谈。大家意见逐渐趋向于利用川、鄂、湘、黔四省边区的有利地势，尽可能地避免和解放军决战，采取解放军惯用的游击战法，并与运动战相结合，以期能保存实力，并相机打击解放军。因此，约在九月底，遂产生了一个所谓“川鄂湘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并推选宋希濂、朱鼎卿、钟彬、陈克非、朱怀冰、彭旷高、张炯、庾贡廷、潘佑强等人为委员；在第一次会议中，又推定了宋希濂为主任委员、朱鼎卿为副主任委员，潘佑强为书记，内设军事、政治、财经、文教、总务五个组。划定湖南境内的慈利、石门、大庸、桑植、龙山、永顺、保靖、永绥、凤凰九个县，湖北境内的来凤、咸丰、宣恩、恩施、建始、利川、巴东、五峰、长阳十个县，四川境内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武隆、南川六个县，贵州境内的正安、婺川、思南、印江、铜仁、后坪、沿河七个县，共计三十二县，为边区所辖地区。随后又继续开过两次会，商定了各组负责人及各组委员，其中除有司令部一部分人员参加外，大多为自武汉逃出的湖北省参议员和国大代表，也有少数来自长沙的。贵州省方面，我原希望欧百川参加“最高决策委员会”，他是贵州苗族，曾进过陆军大学，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过师长、副军长等职，我很想通过他来利用苗族人。他那时正在秀山养病，我曾一再去电邀请他来恩施，但他因病未来。

“最高决策委员会”开过几次会，确定了一些重要方针后，就由各组草拟计划，并分组讨论。在十月上旬和中旬，大家象煞有介事地工作得很紧张，讨论得很热烈，好象只有这个地区还有一点生气，还在想从绝望中找条出路。其实，这只是垂死的挣扎，绝望的挣扎而已。

及到十月下旬，解放军开始向西南进军，防守大庸的一二二军迅被歼灭，巴东亦同时告警，所谓国大代表、参议员以及湖北省府的委员们，吓得惊魂落魄，急急如丧家之狗，拼命地向西逃

往利川、万县、重庆等地。就这样，所谓“川鄂湘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夭折了。我想在这个地区从事游击战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

荆门、宜沙战役

荆门位于江陵北面约八十公里，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东西两面是山，地势利于防守，为自古以来用兵所必争的要地。过去驻守此地的国民党军队，曾构筑不少工事，有的做得相当坚固，我视察过全部阵地，认为有一个师兵力防守，屯备足够的粮弹，是很可固守一个时期的。荆门原系由二十八军的一部驻防，该军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东调后，即交由七十九军驻守。七十九军大部分干部属于陈诚的第十八军系统，系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在四川泸州一带接收新兵组成的，一九四八年秋这个军开到川北的城口、万源一带，以后又开到安康，随后奉令越过大巴山脉进出于沙（沙市）襄（襄阳）公路，归入我的指挥。这个军辖九十八、一九四、一九九共三个师，每师有六、七千人，装备相当齐全，士兵虽多系新兵，但干部大多数有过实战经验。在我所指挥的部队中，除第二军外，这个军是一个力量较好的部队。

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来沙市见我，我曾和他谈到全盘形势，认为今后我们的作战方针，可能是以防守长江为主，目前解放军主力在徐州、蚌埠一带，华中方面只有一些“上八路”，无进攻的力量，七十九军应暂驻荆门附近，待命行动，但军的炮兵营可先开到南岸的公安。他回去后，炮兵营很快就开来沙市过江了，但他可能把今后的意图随便泄露了，到二月三日解放军江汉军区的部队数千人突袭荆门，东端要地文峰塔被解放军占领。方靖张皇失措，即下令叫各部队向南突围，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不赞成，认为这样突围，部队必然散乱，有被消灭的危险，主张固守，并亲率一营反攻文峰塔。解放军因人数不

多，当即退出。但方靖仍然坚持撤出荆门，命各部队分路向西南突围，解放军早已在若干要点埋伏着。就这样，这个军除一九五师的主力系由兴山经水路运输到松滋一带集结没有参加外，军的主力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战斗，就被解放军俘虏了五千多人，包括军长方靖在内。

当三日傍晚战斗刚起之时，方靖曾以急电向我报告并请示，我立即复电，囑固守待援，但复电没有能发出，可能是因方靖已命撤出荆门的缘故，电台叫不通了。我于三日深夜乘车到十里铺，命第二军第九师连夜出发，往援荆门。四日上午我到团林铺二九八师师部（团林铺距离荆门三十多华里），得知荆门已被解放军占领，方靖下落不明，七十九军部队，有数百人一群的，有数十人一群的，大多沿沙襄公路两侧向南去。随后我找到了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了解经过情况后，即命他代理军长职务，负责收容整顿部队。并命二九八师在第九师的掩护下，撤出团林铺、杨家集一带。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渡过长江，相继解放南京、上海等地，盘据在武汉的白崇禧自知不能久呆下去，遂于四月间开始布置江防，命自岳阳城陵矶起至宜昌之南津关止一线的江防部队，统归我负责指挥。我乃于常德设立指挥所，派副司令官周磐负责主持，除我原所指挥的部队担任自宜昌至郝穴附近的江防外，并由陈明仁的第一兵团担任自郝穴（不含）至城陵矶一段。陈明仁兵团当时有新编成的三个军，约使用了半数兵力担任江防，其余的驻在长沙、湘潭、浏阳一带整补。到五月中旬白崇禧移驻长沙后，我就解除了指挥陈明仁兵团的任务。五月初旬我在宜昌和军长以上的指挥官商定的作战方针是：以主力防守长江南岸，竭力阻止解放军渡江；并以有力部队守备北岸的宜昌、沙市两大据点，非万不得已时决不轻予放弃。如解放军在下游渡过长江，我右翼感受包围的威胁时，即由钟彬指挥第十四兵团逐步后撤，撤至渔洋关、石门、慈利、大庸之线。以第二军和第一二四军担任自

拂归至宜都附近的江防（自宜都以下至郝穴附近，归十四兵团负责）。当时我所指挥的部队的补给，主要来自重庆，若无川粮的运济，这样多的人，吃饭是成大问题的。宜昌为长江上游的咽喉，如宜昌过早被解放军攻占，将使部队补给发生严重困难，所以宜昌形势重于沙市。加以宜昌市的东北一带都是高地，形成一条弧形的防卫线，远在抗日战争期间，即在这条线上构筑了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工事，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防守宜昌的队伍又加以增修，某些重要地带还设置了有刺铁丝网等障碍物，是一个利于防守的坚固阵地。因此，第二军和一二四军的部队，当时大部分是驻在长江北岸的。

及到五月下旬，白崇禧突命第二军开往长沙，宜昌防务顿形薄弱，使我深感苦恼。随后第二军又奉命开回宜昌。那时川粮并不能源源接济，离秋收期又尚差两个月，军粮供应极度紧张，根据湖北宜昌专员公署的报告，谓在当阳城附近存有积谷十多万石，远安亦有相当存粮。为了解决部队吃饭问题，缓和补给的困难起见，我乃命重又开回来的第二军在古老背附近渡江，主力部队进驻鸦雀岭一带（在宜昌外围），并派相当兵力进占当阳，同时命六十师以一个团据守宜昌东北一线阵地，主力部队会同湖北保安第四旅进占远安。这些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掩护兵站机关在这些地方抢运粮食，并搜集荆门及襄樊方面解放军的情况。这是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间的事，也即解放军方面所提到的“宋希濂梦想策动华中局部反攻”的实际情形。

七月初，我去常德主持湘西地方土豪所掌握的武力的受编会议，白崇禧亦由长沙赶来参加。正当我们大声疾呼，号召湘西地方势力团结起来对抗解放军的进攻时，解放军集结于江汉地区的强大兵团开始自襄阳南下，冒着炎暑及大雨，克服前进途中的种种困难，迅猛地进抵当阳、远安地区，并有一部猛插到宜昌、当阳间，宜昌、远安间，企图截断我在远安、当阳地区部队的退路。前线指挥官第二军军长陈克非乃急命各部队分路向宜昌的既

设阵地撤退，在撤退中，有一部分被解放军所歼灭。解放军紧跟着向宜昌进攻，战斗于十三日起在宜昌东北地区打得颇为激烈。

我在常德获知宜昌告急的消息后，立即驱车到津市换乘小火轮，十五日晨到达枝江，已有一兵舰在候接，乃改乘兵舰上驶。这时北岸的古老背一带，已均为解放军占领，兵舰上驶，曾遭到他们的猛烈射击，有迫击炮弹百多发，都落在舰的周围，轻重机关枪的射击，密如骤雨。舰上士兵有两人负伤，没有装甲的一些船舱被打了许多窟窿，我立于一块厚达六、七公分的钢板后面，虽子弹打得钢板噼噼作响，因不能穿透，所以颇安全。舰上的平射炮及机关枪亦以猛烈火力向岸上回击。事后我常想起，如果当时没有兵舰来接，我乘小火轮回宜昌，必然在中途被解放军所截停；如果当时在古老背的解放军有平射炮的话，那艘兵舰可能就被击毁了。我于十五日正午回到宜昌，副参谋长罗开甲立即向我汇报了各方面的战况：

1. 向我宜昌东北既设阵地攻击的共军，因我军抵抗较为顽强，战况已比较缓和；

2. 据守在南津关（在宜昌上游六、七华里）以北高地的六十师，自昨日（十四日）下午起，受到相当强大的共军的猛烈攻击，该师奋勇抵抗，双方伤亡颇重，共军不断增兵向左翼迂回包围，若干山头均已被共军占领，现仅剩靠江边少数据点，继续抵抗中，如再失守，南津关被共军占领时，船舶则无法上驶；

3. 自今（十五日）晨拂晓，共军已在古老背附近渡江成功，在该处防守的第十五军部队，因兵力单薄，抵抗渐趋不支，如此处共军继续渡江扩大战果，势将绕到宜昌南岸，严重地威胁我宜昌部队的退路；

4. 另一路强有力的共军，于十三日开始向江陵（即荆州，离沙市十余华里）、沙市进攻，很快就截断了荆、沙之间的联络，据守在该地的第十五军两个团，除被歼灭的外，残部于十三日深夜撤回南岸。共军分数处在沙市至郝穴间渡江，正向公安以

西以南挺进，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已命原驻在石门、澧县的一二二军向大庸转进，命第十五军向石门、慈利以西地区转进，命七十九军及二九八师向渔洋关、五峰一带转进。十四兵团司令部已离开宜都，前往长阳，今后可能转往宣恩附近。

5. 本司令部非必要人员及公文行李等，已于今晨乘轮上驶，到三斗坪待命。

我听取上述情况后，即偕罗开甲前往第二军指挥所会晤陈克非，又相偕到东关外一六四师阵地和北面高地第七十六师阵地，观察了全盘战况。这时相当平静，只有稀疏的枪声，但在北面高地上，清晰地听到南津关北端一带山地枪声稠密。很显然，解放军是暂时缓和正面的攻击，先从两翼猛扑，堵住我军退路，然后一举歼灭。我们回到司令部研究了全盘形势后，决定退出宜昌，第二军主力逐步向巴东、野三关之线转移，以一部位置于三斗坪及曹家畈以西一带山地，扼险防守，阻滞解放军的行动。第一二四军之六十师，可沿长江北岸逐步向西后撤，与在秭归的二二三师靠拢。该军将来视情况再决定是否撤到南岸。本部非必要人员及后勤机构，立即撤往巴东，指挥所暂撤到三斗坪。

我将各项处理完毕后，即偕指挥所人员并挈子女登上长江上游舰队的永绥舰（这个舰队以七艘小兵舰组成，我当时乘的是否是永绥舰，记不清楚了），七艘兵舰，鱼贯上驶，舰与舰之间相距甚近，因当时南津关以北一带高地，已大部分被解放军攻占，其火力已能控制江面，舰队通过南津关时可能将是一场严重的战斗。舰长为照顾我的安全，将我安置在南面的一间房舱里。果如预料，当前面两舰驶近南津关关口附近时，在山上的解放军开始以炽盛的火力向舰队射击，舰队亦以猛烈的火力回击。这时长江正值涨大水时期，南津关附近，水势尤为凶猛，汹涌的波涛与激烈的战斗，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场面，在舰上的人，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地听候着命运的摆布。经过半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安全通过了南津关，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我在三斗坪住了五天，主要是以电台和各军师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等到陈克非来到三斗坪向我汇报了宜昌撤退情形及第二军各师到达位置后，我就转往巴东。在巴东呆了约十天，于八月初将司令部移驻恩施。

这次宜沙战役，历时七天（自七月十一日开始作战时起，至十六日宜昌解放时为止），由于解放军指战员的无比英勇，以及宜沙地区人民的渴望解放，我的“巩固江防、确保宜昌、沙市为江北根据地”的妄想，象肥皂泡沫一样迅速地破灭了。在作战及撤退中，第二军、第十五军、第七十九军、第一二四军，都各损失了一部分兵力，总数约为七千人左右。

宜沙转进后的部署

宜沙撤退转进到巴东、野三关、渔洋关、石门、慈利以西一带山地至大庸之线后，指挥系统变更了。八月初，国防部命令我所指挥的队伍改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依托鄂西、湘西一带的山地，背靠四川，形势似乎较前有利了。但我深知这样一些残破不堪的部队，是不能与解放军抗衡的。“绝不能与共军决战，如若决战，一定全部消灭”，这个思想在我脑筋里已是根深蒂固的了。把部队拖走，走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去，进行彻底整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这是在宜沙转进后一个相当时期内我的主导思想。自到汉中与胡宗南会商将胡、宋两部主力撤往滇缅边区的计划不为蒋介石所采纳后，我又想在川鄂湘黔边区打游击，这在前面已叙述过了。但是，究竟应该在哪儿打？怎样打法？我和司令部的高级幕僚讨论过多次，都没有得出结论，从而也就不能拟出具体的作战方针。有一次，曾经研讨到一个方案，主张将主力部队撤到乌江以西，缩短防线，节约兵力，从四川方面得到补给也较为便利。大家亦多赞同此案，但考虑到如我军主力部队后撤，解放军必接踵而至；过早地放弃

湘西、鄂西大片地方，必然使整个后方震动，必然为国防部所不能同意。这样，只得就现有态势，部署兵力，采取了单纯防御性的作战方针。当时兵力的部署大致如下：

1. 以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辖第二、第一二四两个军，共五个师）守备巴东至野三关之线，由该兵团抽出两个师兵力位置于建始附近整补，并作为机动部队；

2. 以钟彬的第十四兵团（辖第十五、第七十九、第一二二等三个军，共八个师）守备五峰至大庸之线，并从七十九、十五两军中各抽出一个师位置于鹤峰、来凤一带整补，并作为机动部队。

3. 以一一八军作为总预备队，其二九八师应位置于黔江附近整补，其第五十四师应位置于恩施附近训练。

4. 鉴于兵力不敷分配，沅陵方面不派正规部队驻守，交由收编的地方武力负责。到九月间把原收编的五个师统编为暂编第一军，派陈子贤为军长；同时根据派在沅陵一带联系地方上著势力的本部高级参谋董仲篪等人的报告，说辰谿张玉琳匪部实力较强，愿意受编，乃又发表张玉琳为暂编第二军军长，目的在于充分利用这些地方土霸势力，以阻滞解放军的行动。

5. 责令保靖、永绥等地方政府，负责破坏川湘公路，以阻碍解放军的运输补给。

一二二军辖二一七、三四五两个师，二一七师仅三千余人，三四五师系南阳地方团队改编的，人数虽有七、八千人，但内部复杂，纪律很坏，所以这个军没有多大战斗力。当十月上旬我们根据搜集得来的情报及国防部的通知，得悉解放军在常德一带集结兵力，似有先攻取大庸、沅陵等地的企图，为大举进军西南准备条件。我当即电知一二二军军长张绍勋严密注意。到十五日张急电报告，解放军已渡过澧水，进到九溪附近，似有绕攻军的左侧背模样；十五日晚，十六日晨，又连续来电报告，说解放军已迫近大庸，战况激烈。我立即复电，命率部向永顺方面转移。到十

六日晚得张绍勋最后一电，说解放军已攻入城内，往永顺退路已被截断，情势万分危险等语。结果，在大庸的一二二军，除在战争发生前两天由副军长丁树中率干部士兵共一千余人已离开大庸，取道永顺、来凤，拟前往四川接领新兵外，其余全部被歼灭，军长张绍勋，师长谌淑周，黄鼎勋均被俘。

丁树中率干部士兵到达来凤后，我立即发表他代理一二二军军长，并将原由第九师副师长高超从第二军抽调的干部士兵六百余人（原准备新成立一个师）改为三四五师，以高超任师长。又将由湖南逃出来的一个保安团约有一千二百余人，统拨交该军。这样，一二二军又有了残部约三千人。

自十月十六日解放军攻占大庸后，紧接着就解放了永顺。我的司令部在恩施，已感受到右侧的威胁，当立即命第二军的第九师、第七十六师开咸丰附近集结。这两个师刚刚向南行进，左翼的巴东方面又告警。十月下旬（大约二十八、二十九日），我决定将司令部第一步移到彭水，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移往南川，同时以电话召在巴东方面负责的一二四军（一二四军部队于八、九月间先后由秭归撤到巴东一带）军长顾葆裕来恩施，当面指示他采取逐步抵抗的办法，切实掌握部队，沿公路向黔江附近转移，并尽量破坏桥梁，以迟滞解放军的行动。

我在恩施将各事处理完毕后，于十一月五日（或六日）偕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陈曾请假去重庆，于是日乘飞机回来，他的司令部已开往咸丰）乘车前往咸丰，深夜始到。这一晚彻夜未眠，集中精力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研究如何应付局势。这时所得知的重要情况如下：

1. 由永顺西进的共军先头部队已于三日占领招头寨（相传太平天国时的石达开曾率大军驻此数日，然后进入四川）。

2. 有共军一部自大庸向桑植前进。

3. 第十五军主力已由慈利西南地区撤退到来凤以北地区，有一个师已到了来凤。

4. 第七十九军当面共军不多，由于该军原在五峰附近，过于突出，钟司令官已命该军主力撤到鹤峰附近。

5. 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已移驻来凤。

6. 原在野三关的一六四师已通过恩施，向咸丰行进，归还第二军建制。

7. 第一一八军的二九八师在黔江附近，其五十四师已由恩施移到来凤龙山一带。

8. 巴东方面共军力量逐渐增多，以勇猛和从两侧包围的作战方法，不断突破六十师、二二三师交替扼守的防线，已逼近恩施附近，顾军长在恩施附近指挥，据其电话报告，恩施大桥已加破坏。

七日凌晨，我和陈克非、罗开甲（司令部副参谋长）等人冒着大雨乘车前往来凤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处开会。大家认为招头寨的解放军如果直取黔江，则所有部队均将被围于咸丰以东地区，对我军的威胁极大。当经商定以第二军主力及五十四师先向招头寨的解放军采取攻击行动，以阻止其西出黔江。正以电话向各部队下达命令之际，忽接黔江紧急电话，谓秀山已于当日（七日）拂晓被解放军占领。这一消息等于晴天霹雳，因为解放军到秀山后，西向可经龚滩直取彭水、江口，北向可经酉阳到黔江，形成更大的包围圈，我军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

处此十分严重关头，大家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我当问钟彬、陈克非：“现在情况这样紧张，你们的意见如何？”钟彬叹了一口气说：“还有什么办法，打光算了！”陈克非说：“一切听主任的决定，最好是赶快想办法不要陷在共军的包围圈里。”经商量后，决定对招头寨的解放军停止进攻，命第二军立即沿公路开彭水，在乌江以西布防，并由该军派有力部队取捷径兼程前往龚滩，万不可被解放军先头占领龚滩；派本部直属工兵营会同第二军工兵营迅速往彭水搭浮桥，以利部队渡乌江；命十四兵团指挥第十五、第七十九两军立即从现地出发，到郁山镇（在彭水

北面约四、五十公里)附近集结待命;一一八军立即沿公路后撤,到江口集结待命;一二四军应以一部选择有利地势,极力抗拒共军南进,主力迅即走小道径往彭水以西地区集结待命。至于一二二军残部,我早已饬先开往南川整顿。

“与共军争要点,争时间,迅速后撤到乌江以西地区去,脱离共军的包围”,成为来凤会议商定的唯一方针。至于到乌江以西后能不能顶得住?能顶多少时间?今后打算怎么办?谁也没有谈。可能是谁也不愿意谈,也可能是谁也没有时间去设想这些问题。

我从来凤回到咸丰又住了一天,咸丰县政府一个人也没有了,城内老百姓也很少,什么东西都买不到,真是无限感慨。对解放军作战,不仅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连地方政府都不能合作,这种仗怎么能打!回想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那个时期,国民革命军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群众对军队的热烈欢迎、积极支援的情形,和今天对比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虽然有这种感想,但没有理解到当年所从事的是正义的、人民的、革命的战争,而现在所从事的则是非正义的、反人民的、反革命的战争这个最关重要的实质问题。

我于十一月九日由咸丰到了黔江,在这里住了四天,每天目睹第二军及第十五军的大部分向西开去,在黔江附近的二九八师也还比较完整,心里感到一种安慰,觉得自己手里还有相当力量。但是对于七十九军、一二四军部队,由于距离较远,能否脱离解放军包围圈,却使我很为担心。电台和他们有几天联系不上,心里更是着急。正当疑虑盼望之际,更为严重的情况紧接着到来了。十二日上午十时左右,我在指挥所和钟彬、罗开甲商讨第十四兵团今后任务时,忽然东门外唐岩河对岸枪声大作,来得太突然,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人来报告,说解放军到了河边,正在设法过河,过河后到黔江仅五、六华里。我立命准备行动,并命二九八师除留一小部戒备外,立即沿公路西开。未几,五千四

师师长董惠十分狼狈地来见我，说该师昨晚行军走了一夜，到快天亮到达河边时，由于渡船少（唐岩河河幅不宽，但不能徒涉，原搭有便桥，已倒塌），后续部队因太疲惫，倒在地下睡觉，不料解放军追击部队突然掩至，该师大部分被消灭了。我听了，真是又急又恼，责备了董惠几句，叫他率残部速开到彭水去再说。接着我和钟彬共乘一辆吉普车及指挥所人员乘两辆卡车出发，走了约三十公里到了梅子关。

我们下车观察，认为该处地形险要，为使大部队在乌江渡河不受解放军的突然袭击，决定命二九八师在梅子关占领阵地，竭力阻碍解放军的西进，使第二军、第十五军在乌江一线有布置防御的时间。当留钟彬在梅子关等待二九八师师长傅碧人到来时，当面给予指示。

我率指挥所人员于傍晚到达郁山镇，当晚电台与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取得了联系，但该军因鹤峰一带连日大雨，许多小河涨水，影响行军，主力尚未通过咸丰、宣恩间公路，我深为该军危惧。当电告各方情况，嘱将部队以团为单位，从解放军包围圈中找空隙突围。一二四军迄无消息。

十三日上午，我在郁山镇西边沿着郁河走了一段，观察该地形势，认为郁河西面一带高地可以设防，当给予十四兵团一纸命令，由该兵团所有部队（其实这时只有十五军两个多师了）在这带布防，竭力抵抗解放军西进，右与第二军联系。约在正午，我抵达彭水。到十五日晨，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带着十分狼狈和异常困乏的神情，来到指挥所。乍一见面，我很高兴，以为他把一二四军部队都带出来了，问明情况后，始悉该军大部分在宣恩、咸丰间地区被解放军节节截断，分区包围而被歼灭了，顾葆裕仅率军直属部队及二二三师残部共约两千人逃出来。十七日晚又得知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仅率军直属部队数百人及一九四师的一部，逃了解放军的包围圈，他本人逃往长江边过江去了。

至此，我所指挥的六个军，一二二军在大庸消灭了，七十九、

一二四两个军在宣恩、咸丰间地区消灭了，一一八军的五十四师在黔江以东消灭了，十五军的一六九师也在咸丰附近消灭了一部分；仅存者为第二军及十五军的大部分和一一八军的二九八师而已。而二九八师在梅子关阵地被解放军猛冲猛打，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亦被消灭了大部，该师无力支持，师长傅碧人乃率残部两千余人逃往长江边，在涪陵下游渡江，以后一直退到成都，和陈克非等联名通电起义。

彭水被焚经过

彭水位于乌江东岸，四面皆山，为川东货物集散地，亦为交通要道。县城没有城垣，仅有一条自南至北长约三华里的街道，紧靠河边。居民约有四、五千人，多为小商贩及船工。平日经常有民船数十艘往来于龚滩、涪陵之间，彭水为船舶必停之地。有轮渡可载运川湘公路上行驶的汽车，还经常有二、三只小木船可渡，虽水流湍急，但河幅仅百多公尺。论理，有这许多可供利用的运输工具，几万人渡江应无困难，而事实竟完全出乎我的意想之外。

当十三日我抵达彭水时，得悉江面没有一艘民船，仅有一只专拖运汽车的小汽轮，还有一只小木船。询问何以如此，始知早几天到此的后勤机构及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已将几十艘民船全部征发，或运行李、物资等开往下游去了。这真使我气坏了，急坏了！工兵营于十四日到彭水后，曾经用过各种方法，但既没有船，水流又急，架设浮桥的企图完全无法实现，而从东面退下来的部队不断涌至，整个彭水全是队伍，老百姓逃避一空，秩序异常混乱。我乃严命除第二军外，任何部队——包括本部直属的警卫团、工兵营、通讯营等，概不准在彭水渡江，即第二军的第九师亦命到上游四十华里处的万足渡江。虽然疏散了一大批，而第二军的直属部队及七十六、一六四两个师，仍有两万人

左右要在彭水渡江。自十三日起昼夜不停地渡运，到十六日正午止，在东岸待运者，包括担任警戒的一个团，尚有八、九千人。我的指挥所设在彭水东面一个小山坡的古庙里，每天目睹渡江这样困难的情形，心中焦灼万状。

十六日下午四时左右，忽然市街的北头起火，我立派侍从参谋黄海云前往调查原因，这时火势不大，并要他找附近的部队长迅速设法扑灭。过了约半小时，黄海云回来报告，说是七十六师某团有一排士兵驻在那个店里，这个店是卖杂货的，存有爆竹颇多，士兵烤火不慎，致使爆竹燃烧，因而烧起来了，他已找到住在附近的一位连长迅速救火。但火势不仅没有扑灭和减弱，而且有蔓延之势。

正在这时，东北面一带高地突然枪声大作，间有追击炮声，留在东岸担任警戒的七十六师某团长（忘其姓名）以电话报告，谓从保家楼（在彭水东二十多华里）方面有解放军千余人沿着公路及两侧向彭水前进，已与前哨接触，他要求我马上过江去。我乃命指挥所人员收拾行李，随即率他们步行前往渡口。这时天色已是黄昏，走到门口，看到火势渐猛，西北风也刮得愈来愈大，火势逐渐向南延烧，心中十分着急。适第二军辖重兵团张团长就在隔壁，立即找他来，要他率所部全力救火，并告诉他可在街中心拆毁一部分房子，免得再向南延烧，他答应遵命立刻去做。我和张团长说话时，彭水电报局局长潘某（忘其名，江苏宜兴人）来找我，我很惊讶，问他为何还没有走。他说：“电报局还有十多人在工作，”并问我，“载波机要不要搬过江去？”我说：“如果不太笨重，我可派人帮你搬过去，现在情况紧张，你可和我一道过江去。”他先答应了，后来觉得自己不应丢了局里职工不管，又回去了。

我大约是在七时左右过江的，过江后，即住在河边的公路站里，八时左右，看彭水火势稍杀，心里感到一种宽慰，但是到了十点多钟又烧起来了，风助火势，愈烧愈猛。这时由于战况的紧

张，在对岸的官兵，人人以抢渡为急，谁也不愿去救火了，一直延烧到十七日上午四点多钟，才不再看见火势的红光，还有四、五处在冒着烟，到八时左右才全告熄灭。

十七日上午十时，陈克非、罗文山（补给司令）、方瞰（新任一一八军军长，原任军长陈希平辞职飞往台湾去了）等来见我，我们谈论了一些情况，我叫方瞰率残部退到武隆去再说。随即我偕陈克非、罗开甲、罗文山同步行到河边，坐在一条长板凳上，观看部队继续在狼狈地渡河。我指着彭水感慨地对他们说：

“彭水烧成这个样子，彭水老百姓将会如何地痛恨我们，咒骂我们！我昨晚一夜未睡，心情实在沉重得很，内心里感到无比的羞愧！自黄埔以来，在军队中二十多年，从未象这次指挥的部队，纪律败坏到这个地步。我们当年在广东的口号和国民革命军的信条，是‘爱国家，爱百姓’，而今天却弄到这样危害百姓，将何以自解！”

我说这番话，一方面由于内心的忏悔，责备自己，同时也是对陈克非说的，因为彭水的被焚，是第二军部队干出来的。但陈克非三年来在山东、河南等地坚决执行蒋介石的“三光”政策，对于这类事，似乎是司空见惯，听了我的话，他丝毫无动于衷，反而满不在乎地说：“战争就是最残酷的事情。”然后他又叹息地说：“国民党的气数已尽，这也是改朝换代中的一劫。”罗开甲说：“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大火。象彭水这样的事，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罗文山不大同意他们的话，说：“象彭水这样的事情，只要部队长管理得严一点，是可以避免的。”

彭水约有八、九百栋房子，被焚达十分之八，自南至北相毗连的一条街几乎是全烧光了，剩下的只是在东南方山坡上一些不相连属的房子。

同蒋经国的会晤

蒋介石于十一月十四日由台湾飞到重庆，十七日派蒋经国带秘书、副官各一人，由宪兵六名护卫，分乘吉普车二辆来前方看我。我事前接到通知时正在彭水西岸，当与在南川的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通话，请其转告蒋经国，约在江口会面（江口属武隆县境，介于南川、彭水之间，为川东一个中等的市镇，我的司令部已于十四日移驻该处），并邀陈克非同去。

我们大约是下午五时左右到江口的，蒋经国已先到约半小时，没有多久，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也来了。相见寒暄后，蒋经国取出蒋介石写给我和钟彬、陈克非、龚传文、刘平、顾葆裕六人的信，每人一封。这六封信，有的是蒋介石亲笔写的，有由秘书写好蒋介石签名的。给我的一封，共五页，是蒋介石亲自用墨笔写的，字体写得颇大，每页只有六、七十个字，全文我记不得，内容大意如下：

首先他说明他于一月间引退求谏的“苦心”，但共产党拒绝和平，竟要我们完全投降，这样将使“党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吾辈亦将死无葬身之所”。为了救党救国，他不能不起来和大家一道与共产党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其次，他特别强调所谓最近在金门的胜利，说：“毙伤俘虏了共军万余人”，以此来证明解放军是可以击败的。最后，他勉励我与诸将士同心协力，坚苦奋斗，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巩固川东战线，“给予共军以迎头痛击。……”

我们谈了一些战况，蒋经国向陈克非、顾葆裕询问部队情形后，吃完晚饭，已是将近七点，陈克非、顾葆裕相继辞去。大约在八时半左右，我和蒋经国单独会谈，一直谈到深夜一点多钟。第二天（十八日）早晨八点吃过早饭后，蒋经国带着我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和前方战况及部队现况表一份，起程回重庆去了。

兹将我和蒋经国谈话的主要内容记述如下：

一开始，蒋经国问我指挥上是否有困难，各军师长是否有不服从命令的事情。我说这种情况倒是没有，但大家多已丧失信心，战斗意志是不坚强的。接着我分析了在川东战场上失败的四个重要原因：

1. 共军实力雄厚，总兵力远较我们优势，尤以共军指战员们战斗意志旺盛，不怕任何困难，作战时猛打猛冲，并经常从一些崎岖小径抄袭我军侧背，弄得许多部队总是被节节截断，分区包围，最后被消灭。

2. 我所指挥的六个军，除第二军较有战斗力外，大多残破不堪，或者是新编成的，战力脆弱，尤以自我军主力部队在东北、平津、徐蚌一带被歼灭后，许多干部对和共军作战，完全没有信心。

3. 鄂西山地，粮食产量有限，就地征发，到了罗掘俱穷的境地，主要是依靠由重庆方面运补，但由于路程远，运输力不够，常常使得前线官兵吃不饱。

4. 鄂西川东一带崇山峻岭，经常多雨，现在已经相当寒冷，入夜尤甚。但各部队所领到的棉军服，尚仅运到半数，连我司令部的警卫团都是如此。你在江口街上，就可看到还有许多士兵身着单衣服的。吃不饱、穿不暖，当然严重地影响士气，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打不赢。

蒋经国对于我的相当愤激的态度和斩钉截铁的语气，感到有些惊愕。彼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话题转到了其他方面，谈论了国际形势，谈论了党务、政治。蒋经国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二十年来，国民党既没有领导政治，也没有领导军队，只有彻底改造国民党，使每一个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都能真正为党的主义而奋斗的时候，才能产生伟大的力量。最后，我问：“贵州已被共军占领，可能一路进取昆明，一路出毕节，进攻泸州，而川东情势又是这样紧迫，总裁对这样严重的局势，究竟打算怎样应

付？”蒋经国对我的问题，作不出任何具体的答复，只说：“现在打算把宗南的第一军调过来，希望这方面能撑持一个时期。”我说：“我只有一句话，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

蒋经国之来，不仅没有使我们产生新的希望，而且更使我们感到失望，觉得蒋介石在这紧要关头到重庆来，拿不出挽救危机的新的有效办法，作风仍是老一套，不过是叫我们拼死抵抗，坐以待毙而已！

最后的挣扎

我们在乌江西岸的布防，是右自龚滩起，至彭水西岸为止，由第二军担任；乌江自彭水起折向西北流，由第十五军在郁山镇、保家楼以西一带高地占领阵地，与第二军相联系，但郁河多处可以徒涉，不能成为障碍。十一日由彭水前进的解放军，遭到七十六师在东岸警戒部队的抵抗，稍有战斗后，即于十七日解放了彭水。但解放军并未在彭水正面作渡江进攻的准备，而是从两翼攻击我们的侧背。沿川湘公路到达秀山后的解放军，以有力部队迅速排除了一切困难，先于第二军抢占了龚滩要地，先头部队即由龚滩向文武堂（在彭水、江口之间）前进，在万足渡江的第二军第九师，本负有到龚滩占领阵地的任务，不料渡江后得知解放军已到龚滩，该师决定改在黄草坝附近占领阵地，阻止解放军迂回到彭水正面部队的后方。第九师到达黄草坝附近时，即与解放军先头部队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当时第九师的兵力和所占的地势，都较解放军那个先头团占优势，因而使那个团受到相当的损失，获得暂时的、局部的小胜利。当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向重庆国防部报告时，他们便大肆宣传竟发表公报称为“川东大捷”。蒋介石且夸耀为“这是黄埔教导团的精神”（第九师前身为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教导第一、二团）。这真是不知羞耻的弥天大谎！我派驻在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以电话向我报告重庆报纸所载

的消息时，我听了真是啼笑皆非！

解放军得悉先头部队遭受优势的敌人的压迫，便不顾一切疲劳和困难，很快就分几处渡过了乌江。向第九师施行反包围。我和陈克非得悉这一消息时，命彭水西岸部队向江口转进，同时命第九师且战且退，结果是第九师在文武堂附近被解放军歼灭了一部，以后一直逃窜到川滇黔边境，在二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号召下，才投靠了人民。

沿着川湘公路西进的解放军，于十一月十五日到达郁山镇、保家楼一带，于十七日开始向郁河以西高地占领阵地的第十五军进攻。在解放军猛打猛冲下，该军抵抗不住，节节向后撤退。到二十日正午，我在江口突闻西北方面有密集的机枪声和迫击炮声，立即派人侦察，始知十五军部队已被迫退到了江口西边约三十华里的中官渡，有些溃兵正在从北面渡过江来。这样，解放军已严重地威胁我们的侧背，如渡过江来截断川湘公路，则我们将全被包围歼灭。我乃命在东面的第二军立即开始向白马山方面转移。白马山位于南川的东北方向，地势很高，川湘公路曲曲折折地在这山上绕行，形势是相当险要的，越过白马山，即进入南川、綦江一带盆地，也就无险可守了。

我率指挥所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离开江口，车过武隆时，据传闻当天早晨在武隆下游约二十多华里处的羊角磧附近，对岸有解放军叫喊“我们是八路军，快把船放过来”之说，此消息虽尚未证实，但十分值得注意。约在下午二时左右，我们抵达白马山山顶，适我所乘的吉普车轮胎炸了一个，又无备胎，我下车察看地势，司机在修理车胎。不到半小时，陈克非和刘平同乘一吉普车来了。陈克非看见我的车不能用了，即把他车上的预备胎交我使用。我把在武隆所听到的消息告诉他，认为不管有无其事，都值得严密注意，因为如解放军在羊角磧过了江，走到白马山上截断川湘公路（羊角磧即在白马山北面山麓），居高临下控制了要点，则我们所有从东面撤下来的队伍都通不过来，情势是可想

的。我紧接着问陈克非能不能抽出一两个连迅速前往羊角碛附近防守，他说办不到。我说：“既然办不到，你军部直属部队的先头部队看来快到了（从山顶可以看得清楚），可叫他们先在北面山腰占领警戒阵地，以防万一。”陈克非答应了。

我于是晚九时左右抵白马场，会见了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他告诉我，第十五军的二四三师被解放军击破后，损失甚大，师长段国杰还掌握着一部分兵力，退往白涛镇方面去了（白涛镇在涪陵南约三十多公里）。第十五军的六十四师大约还剩下一千多人，由师长邱健掌握着，可能已由中官渡附近渡过江来了。他继续对我说，他手里还掌握着七十九军残部一千多人，兵团直属部队一千多人，准备明天一大早开往白涛镇附近布防，作最后一次的挣扎。他叹息地说：“明知是死路一条，但事到如此，又还有什么办法呢！”当晚我是同意钟彬去白涛的，因为我想第二军主力撤到白马山一带布防后，左翼即可与白涛方面联系，这是我部最后一道防线。这样，我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蒋介石和国防部也就无可责难了。这夜我住在白马场南面的一栋民房里，搜集各方情况，彻夜未眠。

二十二日晨五时得到消息，白涛镇已于昨晚被解放军占领。我立即派人去找钟彬，叫他停止去白涛，但钟彬却已于半小时前乘民船两艘顺江而下，到是日上午十一时左右，他就在白涛镇被解放军俘虏了，其残部亦于第二天被歼灭。至此，在左翼的第十四兵团，已是等于完全消灭了。

传闻并不是谣言，二十一日下午果有解放军的一部在羊角碛上游附近的一个渡口渡过江来，迅猛地登上了白马山顶，控制了交通要口。沿川湘公路向西撤的第九师部队，只有军直属部队的一小部分约一千余人通过了白马山，大部则在白马山以东地区被解放军俘虏了。后续的第二十九师残部（第二十九师在文武堂附近歼灭了大半）、第七十六师主力、第一六四师残部、第六十四师残部，因白马山退路被截断，乃急急找僻静小道向南突围。他们一直逃

率到了川滇黔边区，于一九五〇年春在人民解放军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投靠了人民。至此，陈克非的二十兵团，也就基本上完蛋了！

南川密商出路

解放军占领白马山后，以一部向白马场前进。二十三日上午九时我获得解放军离白马场只有六、七华里的报告，当命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的教导总队在白马场附近占领阵地，准备迎击，同时命令其他零星队伍一律开往南川待命，并密示教导总队于我们离开四个小时后即开始撤退，不要与解放军胶着，以致不能脱离。

二十三日正午我离开白马场，将近黄昏时到达南川，清查力量，认为自己可以完全控制的，计有：司令部直属部队——警卫团、通讯营、工兵营共约二千余人；一二二军丁树中残部约三千人；一二四军顾葆裕残部约一千八百余人；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的学生总队教导总队共约三千人，总数约有一万人。

晚饭后我召集一二二军军长丁树中、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军政干部学校代理教育长孔方，本部副参谋长罗开甲、办公室主任陈定等在一个小楼上密商出路。退到重庆去听候国防部处置吗？不仅会受尽那些人的揶揄，同时见蒋介石、顾祝同说什么好呢？这样做，觉得实在犯不着。事情很明显，西南快保不住了，整个大陆都站不住脚了，蒋介石毫无办法，我们也不可能到台湾去，今后他也管不了我们了，那又何必再去受气呢！向解放军接洽投诚吗？说实在的，我们当时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了解得太少，大家都怀着十分疑惧的心理，恐怕此路走不通。大家倒知道过去被俘的军官包括高级将领在内并没有被杀掉，只是从一些归俘中谣传许多人都在做苦工，感到这样的生活太可怕，丁树中（原名丁昌，做过宪兵三团副团长及宪兵司令部的警务处

长，杀害过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罗开甲尤力持反对。我当时也想到我和张治中先生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关系，他去北平前曾一再对我说，要我等他的消息，他会有信给我的，但他一直没有信来，还听说他在北平行动都不自由（事后才知道这也是谣传），无疑，这条路是不能走的。率残部到成都附近去靠拢胡宗南借谋共存吗？觉得这样将是寄人篱下，俯仰由人，亦非善策。

“不管一切，不顾一切，走，快点走，走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不要被共军包围歼灭”，这就是当时我们一致的结论，唯一的结论。选定的目标是：第一步——西昌，第二步——滇缅边境的腾冲一带。选定的路线是尽量避免走大市镇，以减少目标，选择一些偏道绕到峨眉以西地区后，沿着乐西（乐山至西昌）公路到西昌；在西昌休整一两天，即继续走向滇西去。至于沿途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阻碍和困难，以及到达滇西后打算怎么办，我们都没有估计和讨论。会议商定分做二个纵队行进，即由我和顾葆裕、丁树中各率一部，部队到达位置，规定每晚用无线电向我报告。同时规定自行动之日起，禁止无线电台和国防部及其他电台联系。

会议作了上述原则的决定后，我于二十四日晨派副参谋长罗开甲乘车往綦江，对已于前天到了那里的司令部职员讲话，说明今后的艰苦，有家室顾虑的，身体不适于长途行军的，以及不愿再往西行的，一律发薪三个月。这样，当场遣散了二百余人，使我的司令部大大地简化了。同一天早晨，我派办公室主任陈定乘车前往重庆去找办事处处长冷培元，要他们两人负责将存放在重庆的黄金三千多两（这笔款是国防部拨发交本部补给司令部代购十一月份军粮用的）于二十五日上午送来綦江。

大渡河畔被俘

我的指挥所仅有的两辆吉普车都派出去了，二十四日晨我着

草鞋随同大家步行前往綦江。走离南川没有多远，路遇陈克非、刘平，他们问我到哪里去，我不便对他们明言我的企图。尤其是陈克非，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小同乡，而且有如下一段经过，使我对他早存戒心：当八月初程潜、陈明仁等起义时，陈明仁曾有电约我和他取一致行动，我虽拒绝了，但我并没有把此事向蒋介石报告过，以致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八月上旬，蒋介石派其内侄毛景彪（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到重庆调查情况，毛一到重庆，就和在巴东的陈克非通电话，询问鄂西战场的整个情形，并对陈克非说：“老先生指示，要你随时把情况直接用电报报告。”陈克非答：“今后一定遵照办理。”他们这次通话被我司令部检查邮电的情报人员记录下来送给我看，我心中大为不快，觉得蒋介石对自己不信任，他在嫡系部队中还仍然以亲属和浙江人为最可靠，实在太自私了。这件事成为我对蒋介石在思想上的一个疙瘩，从此我决心和蒋介石断绝关系。

因为有上述这段经过，所以当陈克非问我向何处去时，我便假说打算去涪陵一带找钟彬。陈克非、刘平都劝我不要去了，我便反问他们去哪里，他们说想去看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司令官，他的队伍刚由贵州境内开来南川一带），交换一下意见。我说：“我们军事上失败到了这个地步，见了人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不想和你们同去看他。”彼此也就不再说什么，各走各的路了。正午罗开甲由綦江回来，向我汇报遣散司令部人员情形后，我率指挥所人员于当日黄昏时到了綦江附近的二溪镇。

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冷培元带着三千多两黄金从重庆来到三溪。我拨给他一百多两黄金，嘱他送点钱给本部副主任沈静，遣散办事处人员，剩下的作为他今后生活费用；同时我写了一封十分伤感的信，托他带交我的妹妹（那时我的妹妹、妹夫均由湖南来到了重庆），嘱她们俟解放军进入重庆，局势平静后回湖南去。

二十六日上午七时，我们开始离开公路西行，我亲自带领的

一个纵队是本部直属部队及军政干部学校的学生，共四千余人。出发前，我集合干部讲话，简单地说明此行的目的，要求大家不要气馁，沿途严禁骚扰老百姓，凡有妄取一针一线者，就地枪决。并编组两个纠察队，指派军政干校教导处长王珣及司令部高级参谋柳峻田分别负责。在路过白沙附近时，有警卫团一排长上树摘食桔柑，纠察队开枪射击，击中该排长的右腿，显然是做得太鲁莽了。我叫他们采取劝告等方式，以后比较好些。

我所率领的这个纵队的行进路线是：綦江——李市坝——白沙——朱家沱——万定场——石洞镇——怀德镇——赵化镇——观音镇——高店场。每日行程约七十华里，一路尚称顺利。到石洞镇时（石洞在泸州北面四十华里），得悉解放军已进入重庆，大军正沿成渝公路西进，听说内江一带车辆拥塞，秩序很乱，由毕节北进的解放军快要到泸州，泸州已呈混乱状态。当将情形电告顾葆裕、丁树中，嘱他们迅速向宜宾以西地区集结。

到达高店场附近后，本想过江入宜宾再向西去，但在宜宾的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派参谋来通知我，说奉成都顾总长电话，可许宋希濂带少数人入宜宾，部队不准进城云云。这样，我当然不愿去宜宾。我们不得不绕过宜宾北岸一带高地，多走了一天半的路程，才于十二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到达宜宾西边四十华里的牛喜场对岸。这时在牛喜场有一千多自称为红帮的大刀队，拥有少数枪支，封锁江面，不让我们通过。他们都自命为刀枪不入的人，气势汹汹，我派人前往交涉，不仅没有获得他们的谅解，而且把派去的人杀害了一个，迫使我们非用武力对付不可。我乃派高超部（这时一二二军丁树中亦到达那里）及警卫团在上下游两处渡江，围攻牛喜场。不用说，他们的抵抗力量是很微弱的，经过一次扫荡，死的死，伤的伤，大部分逃到南山里去了，我们也没有追击。

下午三时我们渡江到了牛喜场，打算在这里休息一天，因现洋甚少，以金子购买东西找不开，很不方便，预定于翌晨派人去

宜宾以黄金换批现洋。当天傍晚，我的参谋长彭励自宜宾来看我，他因身体不好，带着本部和干校的一些人及行李等，系由重庆乘轮船先到宜宾的。我问他宜宾的情况如何，他说：“郭汝瑰部固守宜宾，恐怕没有这个力量，但郭部的师团长多和我是一同学，我到宜宾后和他们交换过意见，他们已在雷波、屏山等地屯积粮弹，如共军向宜宾进攻，他们就准备把队伍拖入大小凉山打游击，依此情况推断，郭汝瑰部大致不会向共军投诚。”我听了感到高兴，认为解放军必先解决郭汝瑰部，才会派兵来追击我，到那时我已走得很远了，这样，西行途中就会比较安全顺利。彭励对我说明他由于心脏不大好，不适于爬高山及长途行军，不能随我西行，表示十分歉疚。我安慰了他一番，嘱他即在宜宾好好养病，并送了他金子二十两。当晚，彭励就回宜宾去了。

由于多日行军和这一天的紧张生活，感到相当疲乏，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就寝，睡得很熟。不料到深夜，突然有人猛力推醒我，我惊醒了，睁开睡意很浓的眼睛一看，原来是警卫团副团长宋展翔（他是我的堂弟）。我问他深夜来此有何事，他说：“我有一个在军校第二分校十五期的同学，也是同乡，一向和我很要好，他现在郭汝瑰部某师某团当副团长，他那个团奉郭汝瑰之命开来牛喜场监视我们，半夜里由宜宾秘密出发，可能不怀好意，他恐宋先生（指我）遭人暗算，特故意请求同尖兵排在前面走，利用机会乘马快跑来通知我们。”我当问那个副团长（忘其姓名）现在哪里，他说：“他已急急赶回去了，计算时间，明早六、七点钟可到这里。”我一看手表，已是三点多钟。

我当时猜想，郭汝瑰深夜派队伍来，很可能是奉蒋介石（听说蒋介石那时还在成都）的密令，想乘我的不备来解决我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立即起床，通知各部队马上做饭吃，大约在天色微明前，我们便全部离开了牛喜场，冒着滂沱大雨，踏着泥泞道路，高一脚，低一脚，向西行进，足足走了八个钟头，才走完四十华里。

到达高家场，顾葆裕、丁树中两部均已于前一天到了这里。当晚我们商定了第二次的行进路线为：高家场——清水溪——黄丹——慈竹坪——沙坪——金口河——富林——冕宁——西昌，并决定顾葆裕先一天出发，其余队伍在高家场附近休息一天。我当时估计，解放军尚未到宜宾，纵然快到了，解决郭汝瑰部也得花两三天时间，其他解放军大部正在向成都附近前进围歼胡宗南部。没有解放军的追击，沿途虽然不免有些困难，例如道路崎岖、粮秣补给的缺乏等问题，总是可以设法解决的。

但事情却和我所设想的相反。十二月八日下午三点多钟，副参谋长罗开甲带着紧张惊惶的神色跑来对我说：“某参谋刚才在长途电话线上听到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宜宾郭汝瑰部叛变，已派人前往欢迎共军，共军即可到宜宾。”

我听了这个报告后，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解放军到宜宾后，必然很快就会知道我在高家场，必然会派队伍来追击，而且他们行动迅猛，经常不顾一切疲劳和困难，一天行军一百五六十里，在他们不算一回事，这样很快就会追上我们，一经被追上，就很难脱离了。我告诉罗开甲，通知各部队仍按预定计划于明日出发，同时要少校以上的干部于明晨七时集合开一个会。

第二天，是一个寒雨的早晨，天气非常阴沉，我带着忧郁的心情来到一个古庙里，对集合在那里约有一百名的将校级人员讲话，大意是这样的：“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共军彻底打垮了，我们剩下的力量已是很有限了！目前的处境，坦率地对大家说，是十分艰苦，甚至是十分危险。但是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不愿在共产党统治下过残酷可怕的生活，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忠党爱国的军人，有一分钟的生命，便应尽一分钟的责任。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很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今后的日子是越过越苦的，走的是崎岖难行的小道，吃的有时可能很粗糙，甚至不够吃，如果情况紧张的话，可能一

天要走一百多里。……你们自信有勇气有决心愿意随我一齐去干的，便同生共死，勇往直前，不愿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分手，当酌发遣散费……’。

我讲话约一个小时，说得悲凉慷慨，在场的人，多有泣下者。我说完后，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慎重考虑一下，结果，司令部及军政干部学校共有二、三十人领了遣散费走了。我决定把队伍分作几路走，以免太长，耽误行军，并发给各单位一些金子，有一百两的，有五十两的。

川南多山，且值寒冬季节，经常多雨，道路不好走，行军进度颇受影响。我们十四日下午二时左右才到了犍为县属的清水溪。这是岷江上游一个相当繁华的市镇，我派人找商会以黄金换银元，他们答应想办法，但只限于少数，最多只能换三十两，而且规定每两只换银洋四十元，我也同意了。不料这件事情尚未办好，忽然原驻在那里的四川队伍刘树成部（刘湘嫡系）约一个营，仓皇地离开清水溪，开向沐川去，同时商会的负责人及地方行政人员都纷纷逃避，街上商店突然乱纷纷地关上门板。询问之下，始知是解放军离清水溪只有四、五华里了。

这个消息，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正在吃饭，我立即从座位站起来，说了一声：“来得好快！”随即率部队自清水溪向南行，大约走了五、六华里，在一个小山坡上便听到清水溪市街上的机枪声和步枪声，大约是解放军扫荡少数的地方团队。

我们走了二十华里，到了一个小村庄，已是天黑了。大家都觉得行军一天疲乏了，主张在此宿营。我说：“绝对不行！如果今晚不走，不到明天早晨，便都会被共军所俘虏。”命各单位立即做饭吃，晚上九点多钟，开始夜行军。

到十五日上午八时，先头部队到了铁炉场（那里有一个煤矿公司）。忽然后卫部队枪声大作，继之迫击炮弹也连续地射击过来，这是解放军追击来了。我即传令前卫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同时命警卫团的一个营在南面山头占领阵地，阻滞解放军的行进。

我们于下午一时到黄丹，与昨晚到了此地的顾葆裕部及千校教导总队会合，我命顾率所部立即先行，教导总队在黄丹东北高地布防，掩护警卫团撤下来，我率千校学生随顾部之后行进。翻过了几个高山，晚上九时左右到达大渡河边的一个小市镇铜街场宿营。当警卫团回来时，始知该团的第二营已被解放军追击部队在铁炉场以北地区包围解决了。到深夜，一二二军的高超部也来到了，始知丁树中所率的二千多人，被另一路解放军追上包围歼灭了，丁树中下落不明，高超部因走在前头，没有被解放军截获。

自綦江出发，落伍沿途逃散，加上被解放军解决的，达四千人左右，十六日晨到达大渡河边的，实仅五千余人了。除顾葆裕部已先行外，在我身边还稍有战斗力的，为高超部和教导总队。我们沿着大渡河南岸西行，命这两部轮流作后卫。十六日上午十时左右，解放军又追上了我们。由于受地形的限制（右有大江，左有高山），解放军追击部队无法超越我们，只能与后卫部队保持接触，我们昼夜不停的走，解放军昼夜不停的追，迫得我们没有喘息的余地。每天都有几次小规模的战斗，担任后卫的部队，常是一个连或一个排的被歼灭，力量愈来愈少了。道路是这样的难走，司令部原有几十匹骡马，至此有的饿死了，有的堕入悬崖救不出来，行李大部分丢光了。我们只得依靠两条腿，在黑夜中摸索前进。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乏，走，快走，为了一个目的——逃命！

当十八日正午，解放军追我们追得很紧，后卫部队又在进行着抵抗，枪声响彻大渡河谷时，警卫排的名叫万朝生的一个战士（有高小文化程度），忽然在行列中自言自语地说：“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我听后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想到楚霸王乌江自刎，想到石达开在大渡河的结局，联系着自己的目前处境，看来是很难摆脱覆灭的命运了。

经过整整三天三夜极度紧张的战斗行军，我于十八日深夜，也是十九日上午二点多钟，抵达了川康边境的峨边县——沙坪。我感到心力交瘁，疲困万分。顾葆裕已于六个小时前到了这里。原属川

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补给司令罗文山，他所属有一千多人，还有几十辆卡车，路过成都时，顾祝同委以第八纵队司令的名义，率部并带着几十辆卡车于十二月十七日到了峨眉县南边的龙池、新场一带。通过无线电的联系，我告诉他可于十八日晚到沙坪，他便派了上校站长宋湘陵来沙坪候接我。在这危难万分之际，加添了这支力量，使我又产生了希望。但事情总是朝着我所设想的相反方向发展，解放军第十八军的第四十七师这时到了峨眉县，他们的任务本是防止胡宗南部向西昌逃窜，得知龙池、新场一带有反动武装，还有车辆，便立即派了一个团追击。这个团于十九日拂晓到了新场，罗文山率部投诚，而我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

十九日天甫微明，顾葆裕便率所部沿南岸西行向金口河去了，我由于太疲乏，睡了一觉，到早晨七点多才起来，吃过早饭后，便命本部及下校一律渡河，然后会同罗文山部沿乐西公路走。到十点多钟，约渡过了一千人，我也渡河到了北岸山脚下。突然山上枪声大作，机关枪的火力对南岸待渡的队伍扫射，那边队伍便乱纷纷地向南面一带山地逃窜。已经过了河的，一部分向西走，走不到三百步，便被解放军堵住了。我率警卫排向东走，走不到一华里，也被解放军堵住了。在山的解放军，又分几路冲下来了。这样，大家就毫无抵抗地解除了武装。

我在这走投无路之际，觉得当俘虏是多么可耻，抽出手枪准备自杀，正举于时，被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抓住，很快解放军就过来了，我成了解放军的俘虏。但不到半个小时，十天来一直紧紧追击我的解放军某部，来到了南岸东南一带高地，因两岸的解放军事先没有联系，他们便向北岸射击，弹如雨下。我乘解放军无暇看管时，又带了几个人跑到一个庙里的楼上躲藏起来。

两岸的解放军通过号音的联络，知道都是自己部队，误会消除了，北岸的解放军随即进行搜查，我们又被搜出来了。我平时着与士兵同样的草黄色棉军服，当解放军干部询问我的姓名身份时，我答我叫“周伯瑞”，是司令部的一个军需。他们信以为

真，在河边沙滩上，解放军团政委向大家说明解放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后，要大家指出谁是宋希濂，也没有人吭声。就这样，十九日晚在北岸的一些民房里，大家默默地坐在地下过了一夜。不用说，这一夜，我精神上所感受的痛苦，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

二十日晨七时左右，解放军命我们在沙滩集合，准备把我们这一千多人押送到峨眉县去。我想这在路上可能还有逃脱的机会，便暗暗地叫几个亲信靠着我一道走。不料正在这个重要关头，突然王尚述过河来了。

王尚述是苏北人，据他说，他原在解放军，是个相当于营教导员地位的干部，于一九四八年冬在湖南衡阳打入我所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在校进行秘密活动。一九四九年八月他在恩施被发觉，通过审讯后，供出他投入军政干校的目的及种种活动情形。本部第二处和干校的一些重要干部，均主张将他枪毙，我没有同意，亲自找他谈了一次，随即派他在校本部办公室工作。我军转进时，他一直一路跟着走，可能由于走得太累，他掉队了，所以十九日他没有过河来。这天早晨他过河来后，看见我坐在被俘的行列里，立即走向解放军指挥员所住的屋子里去，很快就来了一位许教导员找我去。我懂得了这是为什么，当他一开口问我是谁时，我毫无犹豫地说：“我是宋希濂。”

一九四九年，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不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死了父亲，死了妻子，打了败仗，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虽说这一年我还只有四十二岁，但头发已脱落了不少，两鬓也开始花白了。由于几乎一切事情都不如意，感到心力交瘁，意态索然，觉得应该是自己生命的终结了，活下去还有什么意味！

不，一九四九年，应该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运的一年，应该说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我跟随蒋介石多年，干了不少反革命的罪恶活动，而自己并无认识。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对我的宽宥和教育，使我认清了是非和真理，使我懂得了国民党军队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样，才使我没有带着花岗岩的头脑走向坟墓里去。